

清中期刻帖中的跨階層人際互動與商業考量——《福州帖》摹刻與銷售始末^{*}

姚靈^{**}

提 要

《福州帖》是一部品質較優但關注較少的蔡襄（1012-1067）書法專刻帖，由清中期（1736-1850）的碑帖鐫刻專家錢泳（1759-1844）撰集摹刻於嘉慶年間（1796-1820）。本文通過對現有文獻資料及圖像資料的分析研究，較為清晰地揭示出這部刻帖的摹刻緣起、底本來源和營銷方式，並展現出錢泳與時任福建巡撫王紹蘭（1760-1835）之間圍繞著碑帖鐫刻而產生的互相委託關係，同時對《福州帖》為何品質較優卻流傳較少的原因進行了分析。這項個案研究既有助於認識清中期刻帖行業的大量細節，也有助於考察清中期金石文化興盛的背景之下，圍繞著碑帖製作所產生的人際交往和文化生態。

關鍵詞：《福州帖》、清中期、刻帖、蔡襄、錢泳、王紹蘭

* 收稿日期：2021年8月20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年4月22日。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人在審稿階段提出的寶貴建議，在此深表感謝，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一、前言

《福州帖》是一部蔡襄書法的清代刻帖，¹ 撰集於嘉慶十九年（1814）冬，刻成於嘉慶二十年冬（1815），共四卷，收錄有蔡襄書蹟十五種，附帶蘇軾（1037-1101）書蹟一種。清朝刻帖風氣興盛，尤其是乾嘉道時期（1376-1850），刊刻了大量的法帖，刻帖發起者除了皇家之外，官員、士紳、富商等有足夠財力並追求文化素養的階層均參與其中，同時由於刻帖市場的興旺，碑帖商販和刻帖工匠也因行業之便撰集刊刻了大量法帖，以作牟利之用。《福州帖》正是產生於這種刻帖風潮中，它的撰集緣起、底本來源、銷售渠道以及圍繞著這部刻帖所產生的人際互動實為這段歷史的一個生動片段，通過史料追尋與相關分析，還可以進一步管窺當時的法帖賞鑒及臨習風尚，並考察到不同階層的文士之間圍繞著刻帖這一行為所產生的互動。

《福州帖》的撰集刊刻者為錢泳。² 錢泳字立群，號梅溪，江蘇常州府金匱縣（今屬無錫）人，生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卒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享壽八十六歲，歷經乾嘉道三朝，書法精湛，著有《履園叢話》等書。他於早年應試秀才不售後遂放棄科考，³ 以碑帖鐫刻技藝及書法才能活躍於公卿名士間，一生鐫刻了大量碑帖，正如容庚所言，他「手書碑版幾遍江浙……刻石之富，古今未有也」，⁴ 在《叢帖目》所收錄的約一百七十種乾嘉道時期刻帖中，錢泳參與的多達二十二種，而實際情況還要更多。錢泳既有搜集法帖、編纂刻帖的能力，又善雙鉤摹勒，還能運刀上石，⁵ 可以親自處理刻帖的每一個重要環節。錢泳的碑帖鐫刻

1 蔡襄，北宋名臣，字君謨，諡忠惠，因曾任端明殿學士亦被稱為「蔡端明」，書法史上的「宋四家」之一。

2 關於錢泳，在書法史及刻帖史的範疇內已經有了一些研究文章，分別圍繞錢泳的生平、書藝、書學觀念、碑帖摹刻活動等內容展開。如陳雅飛，〈乾嘉幕府的碑帖風尚——以錢泳為視角〉，收入莫家良、陳雅飛編，《楹聯·帖學·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8），頁147-180；盧慧紋，〈碑與帖的交會——錢泳《攀雲閣帖》在清代書史中的意義〉，《美術史研究集刊》，31期（2011.9），頁205-276；馬成芬，〈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問經堂法帖』の受容〉，《文化交渉 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院生論集》，4号（2015.2），頁165-176；盧慧紋，〈縮率更魯公於分釐之間，運龍跳虎臥於格式之內——錢泳的《縮臨唐碑》與清代楷書風尚〉，收入莫家良主編，《合璧聯珠三——樂常在軒藏清代楹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2016），頁18-29。

3 錢泳早年應試不售，但聲名鵲起之後擁有國子監生、候選布政司經歷及儒林郎等頭銜，應為捐納所得。

4 容庚，《叢帖目》（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591。

5 錢泳早年應試不第後即在蘇州學習刻石技藝，曾親自鐫刻過一些碑帖。名聲漸起後他收有徒

行為在清中期極為顯著，作為一位沒有正式科舉功名的底層文人，他憑藉此技周旋於乾嘉名流之間，獲交於滿清皇族如鄭親王烏爾恭阿（1778-1846）、質郡王綿慶（1779-1804）、輔國公裕瑞（1771-1838）等人，受聘於高官如軍機大臣英和（1771-1839）、戶部尚書劉鐸之（?-1821）等，加入過畢沅（1730-1797）幕府並游幕江浙多年，與阮元（1764-1849）、翁方綱（1733-1818）、孫星衍（1753-1818）、黃易（1744-1802）、潘奕雋（1740-1830）、曾燠（1760-1831）、姚元之（1783-1852）、梁章鉅（1775-1849）等著名官員學者建立私交，可謂當時金石書法圈中之活躍人物。《福州帖》正是錢泳自行撰集刊刻的一部叢帖，通過對其摹刻始末展開研究，不僅可以考察刻帖工作的具體細節，探究刻帖銷售的商業考量和實際的銷售成果，還可以借此管窺底層文人是如何將碑帖鐫刻作為文化資本，進而試圖與身份地位遠高於自己的精英實權階層展開交往。

《福州帖》總體製作較優但歷來較少被關注，除錢泳自撰的碑帖鐫刻目錄《寫經樓金石目》中有詳細著錄外，在近代學者容庚《叢帖目》收錄之前，暫未見到較有影響的著錄或討論類文字。《福州帖》成套拓本亦鮮能得見，今暫時僅能於廣州人民出版社 2016 年影印出版的《容庚藏帖》中可見全貌，這一版本影印自容庚舊藏帖，由容庚於 1977-1979 年間捐贈給廣州市文物管理處，後多年秘藏於廣州博物館，不為外人所知。⁶ 今遍檢海內外主要收藏機構所公開的數據庫資料，包括中國國家文物局近年來公布的「全國館藏文物名錄查詢」系統，均暫未見到有其他《福州帖》的收藏訊息。

本文對《福州帖》的討論除了使用常見的《履園叢話》及《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中收錄的兩種《梅溪先生年譜》外，還著重使用了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兩種《寫經樓金石目》與上海圖書館所藏的《蘭林集》。《寫經樓金石目》為錢泳晚年所纂的平生碑帖鐫刻詳目，現有清刻本（五冊）及錢氏述祖德堂抄本（三冊）兩種，內容互異，抄本似為未及寫定刊刻者。《蘭林集》為錢泳抄錄的乾嘉道名流寄予錢泳的信札，全集原有兩冊，現上海圖書館中僅存一冊。兩種《寫經樓金石目》及《蘭林集》因暫未整理出版而較少被學界所使用，它們作為錢泳碑帖鐫刻情況及社會交往情況的一手史料，對於學術研究有著重要價值。

弟，中晚年的大量具體刻石工作他應較少親自動手，更多的是「督工上石」。

6 見王俊輝，〈幸有斯人獨度藏〉，《出版人》，2017 年 3 期，頁 42-43。

二、《福州帖》鐫刻緣起：錢泳與王紹蘭的交往

《福州帖》的撰刻緣起於嘉慶十九年冬十一月錢泳與新任福建巡撫王紹蘭的會面。王紹蘭字南陔，浙江蕭山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中進士後授福建屏南縣知縣，歷任惠安縣知縣、閩縣知縣、泉州府知府、興泉永道、福建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等職，約二十年之久始終在福建任官，嘉慶十九年五月獲擢為福建巡撫。⁷嘉慶十九年冬十一月，進京陛見後返回福州任職的王紹蘭途經高郵，偶遇錢泳，此時錢泳方應高郵知州馮馨（生卒不詳，活躍於嘉慶年間）之聘參與撰修高郵州志完畢，正欲返回常熟家中，⁸二人遂於高郵同舟渡江，共游焦山。⁹錢泳與王紹蘭多年前便已相識，早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王紹蘭尚未中進士之時，已游幕過畢沅幕府、杭州知府李亨特（?-1815）幕府的錢泳初次進京遊歷，在邵晉涵（1743-1796）府第中與之結識。¹⁰乾隆五十九年（1794）冬至乾隆六十年（1795）春，錢泳在福建遊歷並在福州度歲，期間多與福建地方長官往來，¹¹亦應與初到福建任職的王紹蘭有過會面，但之後多年二人未再有交集。¹²時隔近二十年，兩人均年近六旬，王紹蘭已成封疆大吏，而錢泳則在多年的碑帖鐫刻生涯中結交了更多的高官貴士，他與翁方綱、阮元等學界高官保持著聯繫，並製作了一系列有影響力的刻帖，如他替戶部侍郎劉鐙之奉旨摹刻劉墉（1719-1805）書蹟所成的《清愛堂石刻》、自行撰集成親王永理（1752-1823）書蹟所成的《詒晉齋法書》、替軍機大臣英和鉤刻趙孟頫（1254-1322）書蹟所成的《松雪齋法書》等等，使得錢泳在京城及江浙地方官員眼中已然成為碑帖摹刻的熱門專家之一。此番故人相見，錢泳與王紹蘭共游焦山，品評金石碑刻，錢泳不失時機地向王紹蘭展示自己的金石學問

7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359，頁11361-11362；（清）曹振鏞等奉敕修，《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四）》（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968，嘉慶十九年五月上。

8 錢泳於嘉慶十八年（1783）自金匱遷居於常熟翁家莊，事見（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654。

9 （清）胡源、褚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22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頁233。

10 （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頁155。

11 （清）胡源、褚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頁220-222；（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頁272、376。

12 王紹蘭在高郵會面後給錢泳的一封信中寫道：「乙卯距今……遊蹤隔絕……秦郵之會意外得之，拓篷窗而話舊，剪銀燭以經旬。」乙卯年正是乾隆六十年，「秦郵」為高郵古稱，「剪銀燭以經旬」一句可見兩人此次共處時間至少達到十日。信見（清）錢泳輯，《蘭林集》（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稿本），無頁碼。

及碑帖摹刻專長，王紹蘭亦迅速向錢泳下了一系列訂單。

乾嘉時期金石學大盛，凡有志於經史考據之學人均難以忽視金石實物所提供的寶貴材料，對金石學的關注自然地導致了更多當代「金石」的製造。目睹著前代金石遺蹟被熱烈研討因而「不朽」的現狀，當代有能力的智識階層有著充分的心理動機想創造自己的「金石遺蹟」，因此這一時期碑帖鐫刻行為大量出現，許多出資者和鐫刻者都明確表達了想借碑帖留名後世的願望。王紹蘭素來有心治學，「學務精博、無所不窺」，¹³ 最終在晚年一意著述，宗許鄭之學，精研《儀禮》、《說文》等，著作頗豐，¹⁴ 錢泳在焦山展開的金石話題顯然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

就現有材料來看，錢泳與王紹蘭在焦山探討的內容至少涉及了史籍所載的秦始皇七種刻石、〈石鼓文〉及〈熹平石經〉，這也是歷來最為經史學家所關注的重要石刻。嘉慶十八年（1813）時，錢泳弟子孔昭孔從一位董姓陝西商人處雙鉤到一本號稱南唐徐鉉（916-991）所臨的秦〈碣石門刻石〉墨蹟本，¹⁵ 因「秦至今閱數千年，〈之罘〉〈碣石〉之刻久已無傳」，¹⁶ 錢泳得此，見其文句與司馬遷《史記》所載有異，以為可證《史記》之誤，便將此本視為「奇寶」，在與王紹蘭交談時將之出示。王紹蘭取《史記·秦始皇本紀》校之，稱「不特紀中文字顛倒，韻句舛訛，而是本尚多三十字，足征史記之脫簡」，¹⁷ 於是委託錢泳將此本〈碣石門刻石〉摹刻於焦山。焦山為碑刻勝地，自〈瘞鶴銘〉以下古今碑刻眾多，且多年來以收藏周鼎著稱，為當時文士心中的金石聖地，在此借碑石留名亦是許多文士的願望。錢泳與王紹蘭共游焦山之時，便一同欣賞了由阮元撰文、錢泳書丹的〈焦山仰止軒記〉刻石，該刻石銘記了阮元將自己收藏的明代忠臣楊繼盛（1516-1555）墨蹟送藏焦山的事件，據錢泳記載：「軒上有大樓，即為藏書之所，軒左右壁間刻

13（清）潘衍桐輯，《兩浙輻軒續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685冊，卷16，頁417。

14（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359，頁11362。

15 孔昭孔題跋道：「右徐散騎真跡，一陝客董姓攜來售者，因價昂，留觀一宿，鉤出還之。後有柳文肅貫跋，趙文敏孟俯、揭文安奚斯觀款，危學士素跋，文待詔征明隸書跋，均不及鉤，且不及鈔出以存考據，為可惜耳，嘉慶癸酉夏六月。」見（清）金武祥，《粟香五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184冊，卷7，頁264。

16（清）王昶，《金石萃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886冊，卷4，頁531。

17（清）錢泳撰，《寫經樓金石目》（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刻本），〈重模秦碣石門刻石〉，頁4。因本文同時徵引《寫經樓金石目》未刊本（錢氏述祖德堂抄本），為避免混淆，再引時將於書名後標示「清刻本」。

楊忠湑公繼盛手書，海內名士題跋甚多，洵勝跡也。」¹⁸ 可以想像，王紹蘭充分明白在焦山增添文史遺蹟並刻石留名的巨大影響力，在新任巡撫、官運亨通之際，身邊既有經驗豐富的替高官辦理刻石事宜的能手錢泳，又新見到了被認為有寶貴文獻價值的號稱徐鉉所臨的〈碣石門刻石〉，因而王紹蘭確有足夠的熱情出資將〈碣石門刻石〉摹刻於焦山。

或因石料採買受到限制，重刻的〈碣石門刻石〉並未採用一整塊豐碑的形式，而是由數塊豎長方型的碑石組成，類似書法作品中條屏的形制，這批刻石如今仍存於焦山碑刻博物館。從原石來看，錢泳重刻的〈碣石門刻石〉（圖 1-1）確與現存西安碑林的徐鉉長安本〈嶧山刻石〉（圖 1-2）書風一致，但從石刻精神來說，〈碣石門刻石〉少了勁健之氣，顯得平軟溫和，與現存秦刻〈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殘石相去更遠，因而就此次重刻來說，保存文獻的價值要大於書法藝術價值。現存的碑石共有三塊半，王紹蘭和錢泳分別在碑上留有題跋，王紹蘭的題跋為隸書，單獨占了一塊碑石，該隸書為典型的錢泳書風（圖 2），為錢泳代書無疑。¹⁹ 王紹蘭在題跋中除了稱讚此本〈碣石門刻石〉的文獻價值外，還不無得意地宣稱「雖非丞相斯，尚有典型，不須兄事虞鼎，竟當弟畜〈鶴銘〉耳」，²⁰ 將此次刻石的價值置於焦山重寶周鼎及〈瘞鶴銘〉之上。錢泳的題跋為楷書小字，佔據了半塊碑石，在形式上謹守自己的身份，未與王紹蘭題跋爭輝，他在題跋中寫明此本〈碣石門刻石〉為自己的弟子所覓得，²¹ 並對內容加以考證。

此次刻石的起因為錢泳主動出示自己手中的珍本〈碣石門刻石〉，雖難確知是何人首先提議要將此本摹刻於焦山，但錢泳在委託成立的過程中採取了積極爭取態度應毋庸置疑。從錢泳和王紹蘭的往還信件可知，王紹蘭委託錢泳刻石後即前往福州，隨後的工序及刻石細節均由往來書信商定，刻石的拓樣亦由王紹蘭的

18（清）錢泳撰，《寫經樓金石目》未刊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述祖德堂抄本），〈焦山仰止軒記〉，無頁碼。

19 錢泳替人代書實為常有之事，如立於浙江紹興的〈大禹陵廟碑〉，落款阮元，而實為錢泳所書。

20 此處的「虞鼎」指的是歷來為文人學者所重視的焦山周鼎，翁方綱曾據拓片考訂稱「此鼎實惟虞跡翻」，王紹蘭在此沿用了翁氏之說。見（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455冊，卷70，頁331，〈焦山鼎歌為苴鄰題〉。

21 錢泳在題跋中寫道：「秦〈碣石門刻石〉是予弟子孔昭孔從徐騎省墨蹟雙鈎得之，以為奇寶，實可證司馬氏之訛。中丞王公命予撫勒焦山，並有考據甚詳，真藝林勝事也。案碣石之名始見於〈禹貢〉、〈史記始皇本紀〉及〈封禪書〉，凡數見而《索隱》、《正義》諸家注俱未詳言其處……嘉慶廿年九月金匱錢泳書。」

差人從江蘇捎至福建交王紹蘭過目。錢泳在石上的題跋內容曾呈請王紹蘭批准同意，而刻成之後將石碑安置焦山的具體事宜也由錢泳一力完成。²² 王紹蘭對錢泳的摹刻表示滿意，他曾就題跋的效果寫信稱：「承寄〈碣石碑〉後跋十分，業已收到，鈎勒精妙，逸趣橫生，洵可寶也。」²³ 王紹蘭為這件委託向錢泳支付過「石價」三十六兩銀子，有無其他費用尚難確知，但以通常情況論，這對地方大員來說並不是一筆昂貴的消費。對錢泳而言，這次委託除了有經濟收益外，他亦憑藉此摹刻在焦山金石史上留名，他在題跋中充分披露了自己對此本〈碣石門刻石〉的覓得及摹刻的貢獻，並借考證文字向觀看者塑造了自己的學人身份，同時還公開展示了他與封疆大吏的結交關係。

除了摹刻〈碣石門刻石〉於焦山之外，王紹蘭還向錢泳下了一系列縮刻的訂單。王紹蘭請錢泳縮刻了〈石鼓文〉、秦〈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會稽刻石〉、〈碣石門刻石〉以及漢〈熹平石經〉殘字，以供案頭珍玩。王紹蘭在與錢泳同游焦山時就因錢泳之倡議決定縮刻五種秦刻石，²⁴ 次年三月及五月，又分別追加了縮刻〈熹平石經〉殘字及〈石鼓文〉的訂單。²⁵ 王紹蘭對這一系列縮刻極為上心，在書信中多次關注石料質地、題跋鐫刻等具體內容，且經常催促工期。〈熹平石經〉殘字縮本合併了黃易所藏的宋拓一百餘字及錢泳於乾隆五十年（1785）偶得的五百餘字，共刻成了八碑，每碑高為當時的工部尺九寸七分，約今三十一公分；寬為當時的工部尺五寸一分，約今十六公分。刻成之後，王紹蘭以為「精雅絕倫，足稱珍玩」，²⁶ 「每於公退之暇，置諸坐隅，焚香靜對，如入洛

22 王紹蘭在一封給錢泳的信中寫道：「碣石碑摹本石價三十六兩亦奉繳。尊作題跋謹已拜讀，極為妥致，惟內有偏旁應敬避及家諱數處，謹易之。另寫呈上。俟刻竣即祈安置焦山為荷。」，信見（清）錢泳輯，《蘭林集》，無頁碼。

23 信見（清）錢泳輯，《蘭林集》，無頁碼。

24 王紹蘭在五種秦刻石縮刻完畢之後作記道：「嘉慶十九年冬十一月紹蘭陞見南旋，遇錢子泳于秦郵，偶論金石文字及于秦刻，錢子曰：『《鐸山》之文《史記》不載，宋端拱初，徐鼎臣得而撫之，淳化四年（993），鄭文寶刻于長安國子學。《泰山》則僅存二世文四行廿九字，今毀，惟拓本可傳。《琅琊台》在今山東諸城縣，亦惟二世文十二行隱隱可辨。《碣石》向無傳本，今得有鼎臣墨蹟可撫。至於《會稽》之刻，宋時猶在，元至正間，紹興路推官申屠駟重撫於越庠之稽古閣。惟《東觀》、《之罘》刻失傳久矣，無可據依，今欲斷而小之，試撫其五而闕其二乎』。紹蘭曰：『諾，請遂刻焉。』」見（清）錢泳撰，《寫經樓金石目》清刻本，〈秦刻石縮本五種〉，頁14。

25 具體情形見（清）錢泳撰，《寫經樓金石目》清刻本，〈周石鼓文縮本〉，頁11-12；〈漢熹平石經殘碑縮本〉，頁14-15。

26 見王紹蘭致錢泳的書信，收入（清）錢泳輯，《蘭林集》，無頁碼。

陽講堂，輒令人發尚有典刑之歎也」。²⁷〈石鼓文〉縮本以天一閣范氏藏本為底本，該本阮元曾重刻上石，為公認之最佳本。這套縮刻仿石鼓原樣刻了十石，每石高為當時的工部尺四寸五分，約今十四公分；圓徑為當時的工部尺三寸三分，約今十公分。刻成之後，王紹蘭以為「朴茂古雅，猶見岐陽搜狩之遺」，並在給錢泳的信中寫道：「極荷費神，感謝無既。」²⁸五種秦刻石縮刻的尺寸大小尚未發現有資料記載，推測應與前兩種相去不遠，大小可供案頭清玩。乾隆五十二年（1787）浙江學政朱珪（1731-1806）視學時，曾以「秦刻石」為題歲試紹興府生員，王紹蘭作答順利、獲蒙賞識，被拔為第一，因與秦刻石有此因緣，這套縮刻完成之後，王紹蘭「每念文正公二十年前知遇之感，輒不禁撫碑而墮淚也」。²⁹

焦山同游不僅使錢泳收穫了王紹蘭的一系列碑刻訂單，還在兩人間營造出錢泳費心幫助王紹蘭實現刻碑願望的人情氛圍。在這種情況下，錢泳決定趁熱打鐵，再主動為自己爭取更多的經濟收益和文化知名度。從焦山返回常熟家中後，錢泳立即著手搜集蔡襄書蹟摹刻成帖，因蔡襄為北宋福建興化（今莆田）仙遊籍名臣，在閩中聲望卓著，曾兩次出任福州知州，加之王紹蘭又為福建巡撫、治所福州，故將此帖命名為《福州帖》。刻成後錢泳即擬呈交王紹蘭在福建代為散佈銷售，³⁰欲「傳之十閩，為後生家法，未始非翰墨之一助也」。³¹

三、《福州帖》底本探源

雖然許多明清著名叢帖如《停雲館帖》、《戲鴻堂法書》、《渤海藏真帖》、《快雪堂法書》等都收有蔡襄書蹟，但總體數量不多，有的能夠佔據單獨一卷，有的僅收一兩種帖。在這種情況下，明代莆田人宋珏（1576-1632）集刻蔡襄書蹟（內含宋珏臨本）所成的四卷《古香齋寶藏蔡帖》是清中期所能見到的影響最大的蔡

27（清）錢泳撰，《寫經樓金石目》清刻本，〈漢熹平石經殘碑縮本〉，頁15。

28 信見（清）錢泳輯，《蘭林集》，無頁碼。

29（清）錢泳撰，《寫經樓金石目》清刻本，〈秦刻石縮本五種〉，頁14。朱珪諡文正。

30 錢泳在《福州帖》後的跋語稱「將以寄呈制府汪稼門先生、中丞王南陔先生」，王南陔即王紹蘭，汪稼門即時任閩浙總督的汪志伊。嘉慶元年（1796）錢泳曾游幕於浙江督糧道張映璣署中，與時任浙江布政使的汪志伊有所往來。此次《福州帖》的摹刻實起緣於錢泳與王紹蘭的交情，帖成之後亦直接寄交王紹蘭，但因汪志伊官位更高、曾提拔過王紹蘭且與錢泳為舊識，故題跋時將汪志伊列上。

31 此為錢泳在《福州帖》後的跋語。

襄專刻帖，如趙懷玉（1747-1823）稱「蘇文忠《晚香堂》、蔡忠惠《古香齋》凡臨池之人幾於家有其帖」，³² 梁同書（1723-1815）稱：「法帖中匯一人而成帙者……今則東庫二王帖外，唯宋蔡端明書流傳較多，古香齋刻大小行楷四卷，稱精備焉。」³³ 但這部《古香齋寶藏蔡帖》以棗木刻成，其選帖及摹刻並不如人意，碑帖專家張伯英認為其中約有一半為偽蹟，³⁴ 晚清陳榮仁（1837-1903）認為「其刻僅存形似，兼之棗板蝕蠹，殊不耐觀」，³⁵ 可見並非佳刻。蔡襄墨蹟較之宋四家中的蘇、黃、米三家，向來流傳較少，史料中屢屢見到蔡襄書蹟難得的感歎，清初笄重光（1623-1692）曾言：「蘇、米二公手跡海內爭購，至今流傳卷冊尚多，惟蔡忠惠絕少，世亦不知求覓。」³⁶ 乾嘉時張廷濟（1768-1848）亦言：「蔡書較蘇、黃、米為尤難得，嘉善謝若農中翰集刻《望雲樓帖》，求之數十年，終不能得隻字。」³⁷ 錢泳在多年的碑帖摹刻生涯中借工作之便曾飽覽過多位藏家的收藏，他雖財力不豐、無力購置名家法書，卻有較多機會能夠將其他藏家的收藏以雙鉤等方式複製留底、以備他日摹刻上石之用，因而在蔡襄書蹟搜集上，他較之許多財力豐厚者更有優勢。在《古香齋寶藏蔡帖》品質不如人意、其它蔡襄書蹟又較為稀見的情況下，錢泳認為出現了商機，他將搜集到的十五種蔡襄書蹟分四卷摹刻上石，歷時一年便已完工。

《福州帖》中收錄有蔡襄的草書、行書及楷書作品，有長卷亦有大量短割，蔡襄為時人耳熟能詳的作品如楷書〈萬安橋記〉、〈茶錄〉、〈荔枝譜〉等不收，凡見於《古香齋寶藏蔡帖》的也一律不收，體現出錢泳想摹刻一部「稀見蔡襄法書」的願望。

《福州帖》第一卷所刻的是蔡襄行書長卷〈自書詩稿〉（圖3），該帖流傳有緒，有宋、元、明、清諸人的題跋及鑒藏印，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康熙年間

32（清）趙懷玉，《亦有生齋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419冊，文卷8，頁615。

33（清）梁同書，《頻羅庵遺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353冊，卷10，頁150。

34 張伯英，《張伯英碑帖論稿·釋文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頁229。

35（清）陳榮仁，《閩中金石略》，收入《歷代碑誌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第22冊，頁532。

36（清）高世奇，《江村銷夏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第826冊，卷2，頁518。

37 容庚，《叢帖目》，頁1572。

梁清標（1620-1691）曾收藏此卷並將之刻入《秋碧堂法書》（圖4）。乾隆年間，該件法書成為畢沅的收藏，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五年（1790）間，錢泳在畢沅幕府替畢沅摹刻《經訓堂法書》時曾目睹此件墨寶，他在《履園叢話》中詳細記載了該卷的情況並稱「其書雖草草不經意，實君謨妙墨也」。³⁸《經訓堂法書》是一部大型叢帖，其摹刻工作需要一個團隊才能完成，錢泳得到了畢沅的信任總理摹刻事宜，但實際上進行雙鉤摹刻工作的並不止錢泳一人，因此〈自書詩稿〉刻入《經訓堂法書》時是否由錢泳親自雙鉤或摹刻尚難確知，但錢泳借工作之便留有底本應為事實，這份底本日後就用來摹刻《福州帖》。將《經訓堂法書》本與《福州帖》本對比（圖5），可見二者相似度較高。

將現存墨蹟與《秋碧堂法書》本、《經訓堂法書》本及《福州帖》本對比，³⁹可見整體行列上，《秋碧堂法書》本對原蹟行列所做變動較大，縱向排列的字數多於原蹟，而《經訓堂法書》本及《福州帖》本除了少數局部外，基本忠實地反映了原作的行列分布。從摹刻細部看，《秋碧堂法書》本對原蹟的細節反映常較之《經訓堂法書》本及《福州帖》本更為忠實。如圖6所示的「之」字最後一筆下側輪廓處的不勻整，《秋碧堂法書》本中呈現出了清晰的還原意圖，在《經訓堂法書》本中尚可窺見原作的筆致，但已做了較大修整而趨近勻整，到了《福州帖》中，可以見到進一步的修整傾向，筆致顯得勻淨齊整，原蹟中自由書寫而出現的意外筆墨效果已不存在。同樣的情形還可從圖6所示的「耐」字右部豎提鉤的鉤部可見，原蹟的提鉤處有一個向左下方向出筆而又回鋒的小動作，《秋碧堂法書》本中可見到這一細部動作，《經訓堂法書》本及《福州帖》的筆畫則有明顯修整傾向，尤其是《福州帖》，已呈現出一個相對標準的三角形提鉤形態。從圖6所示的「風」字左邊的豎撇的形態對比可見，原蹟與《秋碧堂法書》本均展現出了較為勁健的神采，而《經訓堂法書》本則由於筆致出現波動而呈妍美狀，《福州帖》大略繼承了這一筆畫形態。由此可見，《經訓堂法書》本確有在細部修飾原蹟或更改原蹟風貌的情況，但由於錢泳只是受畢沅之託總理全帖摹刻事宜，尚不能確定他是否直接導致了這些變化的出現。在《福州帖》的摹刻過程中，無論錢泳親自動手幾何，此帖的質量必然在他的全盤監督之下。在使用了製作《經訓堂法

38（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頁271-272。

39 考慮到帖石受損、拓本製作及影印過程的影響，這種對比主要基於各個版本中形態清晰的點畫而展開，一些筆致模糊之處或不能反映原刻水準，在此盡量避免討論。

書》時的底本的情況下，可以看到原作的局部細節出現了進一步的失真，變得稍顯「規範」與「圓潤」。但客觀而言，除開局部的失真，《經訓堂法書》本的整體摹刻質量仍然較優，對於原作總體神采的把握也較為準確，這一點從圖 6 最後一行的對比中可見一斑。碑帖專家張伯英曾言蔡襄〈自書詩稿〉的摹刻，「《秋碧》、《經訓》二刻，均能傳其筆勢，如見墨跡」，⁴⁰可謂中肯。張伯英似未見過《福州帖》，不曾下過評語，但從對比中可見，《福州帖》在大致面貌上承接了《經訓堂法書》本的摹刻水準，在當時的碑帖市場上來看，底本為蔡襄真蹟，摹刻雖有細節修整，但整體面貌仍顯忠實，因而尚可稱為佳刻。

在整部《福州帖》中，〈自書詩稿〉極可能是唯一一件以蔡襄真蹟為底本的。畢沅在嘉慶初年被抄家後，蔡襄〈自書詩稿〉的真蹟隨之沒入內府，《經訓堂法書》本及《福州帖》本就成了當時民間所能見到的「下真蹟一等」的善本，堪供珍賞。錢泳將此帖置於《福州帖》全帖之冠，一方面是因為此帖篇幅較長，又由真蹟摹入，極為難得，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此帖的內容為蔡襄從福州進京時的沿途詩稿，正與《福州帖》之名相配。

《福州帖》第二卷摹刻了蔡襄楷書〈謝賜御書詩表〉，並附刻了蘇軾的〈天際烏雲帖〉⁴¹。蔡襄的〈謝賜御書詩表〉作於宋仁宗（1010-1063，1022-1063 在位）親賜手蹟之後，如今可知的墨蹟本至少有四件，⁴²影響較大的主要是兩件，一件現藏於日本東京台東區書道博物館（簡稱書博本）（圖 7-1），後有米芾（1051-1107）、文及甫、鮮于樞（1246-1302）、趙孟頫、解縉（1369-1415）、吳寬（1435-1504）、董其昌（1555-1636）等十八人題跋，該本曾入乾隆內府，後賜皇六子永瑤（1744-1790），又轉入民間，流傳有緒；另一件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後有文及甫、崧、鮮于樞、吳寬四跋，該本進入清內府後被著錄於《石渠寶笈初編》，後被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6 在位）刻入《御刻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簡稱《三希堂法帖》）（圖 7-2）。這兩個本子內容一致，但書風區別甚大，如今書博本被普遍認為較之國立故宮本更為接近真蹟。從《福州帖》來看，錢泳所選擇的底本接

40 張伯英，《張伯英碑帖論稿·釋文卷》，頁 229。

41 關於〈天際烏雲帖〉的詳細討論，可見衣若芬，〈蘇軾〈天際烏雲帖〉詮解〉，《文學評論》，2015 年 4 期，頁 211-220。

42 參見林司洋、新井惠理佳，〈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蔡襄〈謝賜御書詩表〉墨蹟本之探討〉，《故宮文物月刊》，421 期（2018.4），頁 77-87。

近於書博本，但其結體與筆致和書博本有所差距，從現有史料來看，他應未曾寓目過書博本原件，亦不可能從此件上石。錢泳曾自述在收藏家陶珠琳處得見墨蹟本〈謝賜御書詩表〉，稱「字如指大，結構精嚴，後有文與可、米元章二跋……往時見雲南周氏刻入《春雨樓帖》（注：即《聽雨樓帖》）」，⁴³該本「索價五百金」。⁴⁴從題跋情況來看，這並非書博本，錢泳極可能是將陶珠琳本雙鉤摹刻上石的。在摹刻《福州帖》的前兩年，錢泳曾自行撰刻了一部十二卷的大型古人法書叢帖《小清秘閣帖》，其中就刻有這本〈謝賜御書詩表〉，在此次摹刻《福州帖》時，錢泳將之前的底本再使用了一次，可見錢泳較為看重此帖的價值。從《福州帖》的摹刻情況來看（圖 7-3），這件陶珠琳收藏的墨蹟本可能為書博本的某個臨摹本，與書博本在結體及點畫細節上有不少差異，但在反映蔡襄書蹟的真實面貌上要勝於《三希堂法帖》本。錢泳雖知《聽雨樓帖》亦刻有〈謝賜御書詩表〉，但從現存的《聽雨樓帖》拓本（圖 7-4）及原石來看，⁴⁵它與《福州帖》細節差異不少且行列不同，應當並非同出一個底本。《聽雨樓帖》是活躍於乾隆朝前中期的官員周於禮（1720-1779）的私家刻帖，其中所收的〈謝賜御書詩表〉可能是來自另一個源出書博本的臨本。

蘇軾的〈天際烏雲帖〉被附刻在《福州帖》第二卷之後，蘇軾極為推崇蔡襄書法，多次稱他為「本朝第一」。〈天際烏雲帖〉先是抄錄了蔡襄的〈夢中作〉一詩，其後所述內容亦與蔡襄軼事有關，被附刻在此正好為蔡襄書法增色。蘇軾在乾嘉文人圈中地位極高，當時常有「壽蘇會」之舉辦，非常推崇蘇軾的翁方綱在當時收藏了一份墨蹟本的〈天際烏雲帖〉，他視若珍寶，對之詳加考訂並認定其為真蹟，在文人圈中影響甚大。嘉慶二十年即摹刻《福州帖》的這一年，錢泳因撰集另一部刻帖向翁方綱商借蘇軾法書，翁方綱回信時贈送給錢泳一部新刻的〈天際烏雲帖〉，⁴⁶但錢泳卻未在《福州帖》中使用翁方綱的藏本。從圖 8 的對照來看，《福州帖》本與清初馮銓（1595-1672）《快雪堂法書》本極為相似，而與翁方綱所藏墨蹟本在細節上有多處不一致，這一點從「含」、「重」、「樓」等字的形態上

43 道光年間錢泳家刻的「述德堂」本《履園叢話》在此處刻作「春雨樓帖」，並在書中稱「雲南周侍郎於禮刻有《春雨樓帖》」，但這套帖實以「聽雨樓帖」名世。

44 （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頁 271。

45 《聽雨樓帖》原石現存於蘇州獅子林。

46 兩人往來信件見（清）錢詠輯，《蘭林集》，無頁碼。

均可清晰看出。究其原因，是因為錢泳始終認為翁方綱所收的〈天際烏雲帖〉不真，⁴⁷因而錢泳直接摹自《快雪堂法書》本的可能性極高，且摹刻品質較精。

《福州帖》第三卷摹刻了蔡襄的七件作品，均為手割。第一件為楷書〈春暄帖〉，⁴⁸又名〈與親家評事書〉。此帖暫未見有傳世墨蹟本，亦較少見於流傳的各種叢帖中，目前已知周於禮所刻的《聽雨樓帖》有收錄。就作者目見的《聽雨樓帖》拓本及帖石來看，此刻與《福州帖》行列差距頗多，細節亦有差異，錢泳從《聽雨樓帖》翻刻的可能性不大。〈春暄帖〉風格接近於書博本〈謝賜御書詩表〉（圖 9），氣息沖淡平和，蔡襄落款為「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事蔡襄」，可見此帖寫於蔡襄出任福州知州之時，錢泳將此帖置於第三卷之首再度呼應了《福州帖》的帖名。

《福州帖》第三卷第二件為行草書〈瞻趾帖〉，又名〈郊燔帖〉、〈與知郡司門書〉，現有墨蹟本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 10-1）。此作常被視為蔡襄行草書代表作之一，自宋以來有多部刻帖收錄，清中期收錄此帖的叢帖亦有數種。錢泳應未有機會寓目故宮墨蹟本，將《福州帖》本（圖 10-2）其它刻帖相較，可見與清初《快雪堂法書》本（圖 10-3）、康熙年間《翰香館法書》（圖 10-4）本等相似度均較高，而這數本與現存的墨蹟本差異亦不太大，推測錢泳是擇一舊拓重摹而成。《古香齋寶藏蔡帖》亦刻有一件〈郊燔帖〉（圖 10-5），從書風來看，為偽作無疑，同為蔡襄書法的專刻帖，錢泳所刻的〈郊燔帖〉在此實有糾正之功。

《福州帖》第三卷第三件為行書〈紆問帖〉，現有墨蹟本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 11-1）。明清以來有數部叢帖摹入，乾隆時的《玉虹鑒真帖》及《聽雨樓帖》均有摹刻，與故宮所收墨蹟本差距不大。《福州帖》本（圖 11-2）雖與上述三個本子大體規模不差，但行列明顯不同，細節差異亦較多，推測錢泳的底本另有來源，可能來自某件舊拓。

47 錢泳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初見翁方綱時即獲觀翁氏所藏的〈天際烏雲帖〉，當時便認為不真。翁方綱在〈跋天際烏雲帖〉中寫道：「予所藏〈天際烏雲帖〉實是坡公的筆無疑，昔友人來觀多有致疑者……今年夏，錢梅溪訪予於濟南，出此示之，亦以為不真。今日晴窗，平心諦玩，乃知是真本，無可複疑。甚矣，真鑒之難言，而真物僅存，終不以人言惑耳。壬子除夕記。」見（清）翁方綱撰，沈津輯，《翁方綱題跋手簡集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 304。錢梅溪即錢泳，壬子年即乾隆五十七年。可見多年過去，錢泳始終不認可翁方綱所藏之本，儘管翁方綱地位崇高且特意供錢泳刻帖之用而贈送家刻本，錢泳仍然堅持己見。

48 本文在述及《福州帖》中的帖名時，優先使用錢泳在《寫經樓金石目》中著錄的名稱，同時也對該帖的其它名稱予以說明。

《福州帖》第三卷第四件爲行楷書〈誌文帖〉（圖 12），又名〈與至孝延平書〉，暫未見墨蹟本傳世，目前也未見到有其它刻帖收錄，來源暫時不詳。從帖文內容來看，此信所述爲蔡襄應人之託撰寫墓誌且推辭書篆之事。

《福州帖》第三卷第五件爲草書〈新記帖〉，又名〈陶生帖〉，現有墨蹟本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 13-1），曾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明清以來此帖被多部叢帖收錄，乾隆時所刻的《三希堂法帖》應以之爲底本（圖 13-2）。⁴⁹《福州帖》本（圖 14-1）與現存墨蹟本大體規模相似，但行列不同，細節亦有差異，與《三希堂法帖》本相較，差異亦不小，因而不可能以這兩個本子爲底本。明代的《渤海藏真帖》本（圖 14-2）與《福州帖》本行列一致，字形亦大體相似，推測錢泳可能是由此帖或類似的其他刻帖摹入。

《福州帖》第三卷第六件爲行楷書〈光臨帖〉，又名〈持書帖〉、〈與賓客七兄書〉，現有墨蹟本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 15-1），明清以來見於多部叢帖。將《福州帖》本（圖 16-1）與墨蹟本、《快雪堂法書》本（圖 16-2）、《三希堂法帖》本（圖 15-2）相較，可見大體相似，尤與《快雪堂法書》本最爲相似，有可能是從此帖摹入。《福州帖》本末尾部分有兩行行列與以上諸本均不相同，存在錢泳因帖石面積之故稍微調整行列的可能性。

《福州帖》第三卷第七件爲行草書〈山中帖〉，又名〈與一哥書〉、〈連日山中帖〉，現有墨蹟本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 17-1）。從目前可見資料來看，此帖爲歷代叢帖所收不多，明代《潑墨齋法書》有收錄。〈連日山中帖〉的書風與常見蔡襄書風差異不小，流傳亦相對較少，收錄在此頗具參考價值。《福州帖》本（圖 17-2）較之國立故宮墨蹟本，大體形態不差，但細節差距較多，而更接近於《潑墨齋法書》本，因此錢泳有可能是從《潑墨齋法書》或其它類似拓本中重摹上石的。

《福州帖》第四卷摹刻了蔡襄的六件作品，爲一份詩稿和五封手劄。第四卷第一件爲行楷書〈探花帖〉，即詩稿〈山堂書七絕二首〉，現有墨蹟本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 18-1），明清以來多家叢帖有收錄。《福州帖》本（圖 19-1）與墨蹟本、《渤海藏真帖》本（圖 19-2）、《聽雨樓帖》本、《玉虹鑒真帖》本（圖 18-2）等相較，形模雖大體相近，但細節差距較大，且行列與諸本均不一致，推測錢泳

49 《三希堂法帖》摹刻時常大幅改動底本的行列分布，但單字的具體細節大致能夠保持。參見張多強，《〈三希堂法帖〉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應別有底本來源。同為乾隆年間摹刻的《聽雨樓帖》本與《玉虹鑒真帖》本相似度較高且與墨蹟本較為接近，而《福州帖》應未使用以上兩種年代相近的刻帖作為底本。

《福州帖》第四卷第二件為行書〈至都帖〉，又名〈遠蒙帖〉、〈與彥猷侍讀書〉，現有墨蹟本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 20-1）。目前可知清中期有數部叢帖收錄，《三希堂法帖》本應以之為底本（圖 20-2）。錢泳在之前的《小清秘閣帖》中亦刻有此帖。《福州帖》本（圖 21）與現存墨蹟本相比，細節差距較大、行列不同且有漏字，與《三希堂法帖》本相較亦然，錢泳應別有底本來源。

《福州帖》第四卷第三件為行書〈大研帖〉，又名〈與彥猷書〉，現有墨蹟本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 22-1），明清有數部叢帖收錄。《福州帖》本（圖 22-2）與現存墨蹟本相比細節差別較大，整體風貌有所改變且行列不同，與《渤海藏真帖》等刻帖亦不相同，應別有底本來源。

《福州帖》第四卷第四件為行書〈謝郎帖〉，現有墨蹟本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 23-1），明清有數部叢帖收錄。《福州帖》本（圖 23-2）與現存墨蹟本差別甚大，字蹟大小不同且行列不同，帖後所刻的「蕉林居士」、「樵李項氏世家寶玩」二印也為墨蹟本所無。《福州帖》本與《渤海藏真帖》本（圖 24-1）、《三希堂法帖》本（圖 24-2）均有差異，後兩者與墨蹟本區別亦較大。錢泳的底本來源已難以追尋，從兩方印鑒為著名收藏家梁清標、項元汴（1525-1590）之印這一點來看，不排除是坊間為出售牟利而特意製作的寫本或刻帖。

《福州帖》第四卷第五件為楷書〈門屏帖〉，又名〈與推官呂君書〉，現有墨蹟本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 25-1），乾隆年間數部叢帖有收錄。此帖字數較少，《福州帖》本（圖 25-2）與墨蹟本大體相似，但細節有差異，推測錢泳是從其他底本摹入。

《福州帖》第四卷第六件為行草書〈縣君帖〉，又名〈與郎中七兄書〉，暫未見到墨蹟本傳世，明清多部叢帖有收錄。《福州帖》本（圖 26-1）與明代的《渤海藏真帖》本（圖 26-2）、康熙年間的《翰香館法書》本（圖 27-1）差別較大，字數行列均不同，與康熙年間《職思堂法書》本（圖 27-2）大體形模相似，行列亦同，但有缺字，推測錢泳是擇了某一種與之相近的舊拓進行摹刻。

從上述底本探源可知，錢泳在摹刻《福州帖》時使用了墨蹟和舊拓作為底

本，這與他自己在《福州帖》跋語中所稱的「或墨蹟或舊搨」情況相符。《福州帖》前兩卷由墨蹟上石（《天際烏雲帖》除外）、後兩卷由舊拓上石這個推測應當不差。全帖第一卷的《自書詩稿》由真蹟上石、最有價值，其它所收錄的蔡襄書作大多也有較可靠的墨蹟本傳世。雖因條件所限，無法從這些墨蹟本直接上石，但從最終成帖的效果來看，細節差異雖然不少，但大多數帖的基本形模還在，暫未發現如《三希堂法帖》本〈謝賜御書詩表〉那樣的較偽之作，更要遠勝偽帖將及一半的《古香齋寶藏蔡帖》，這在真偽混雜的刻帖市場中已屬難得。錢泳當年手邊可供參考選擇的舊拓究竟有哪些如今已難確知，有不少拓本應已湮沒於歷史之中，他在《福州帖》題跋中稱「每見類帖所收如《渤海》、《墨池》、《停雲》、《快雪》」，可知他至少參考過這數部刻帖，其中《快雪堂法書》久以多收真蹟且鐫刻精良著稱，亦獲錢泳盛讚，⁵⁰他直接使用其中一些法帖作為底本實為順理成章。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年間所刻的收集蔡襄書蹟較多的叢帖如《三希堂法帖》（收錄 12 件）、《玉虹鑒真帖》（收錄 8 件）及《聽雨樓帖》（收錄 10 件）等似未被錢泳採為底本，儘管現有資料表明錢泳對這數部帖均曾寓目，⁵¹箇中原因大概只能歸結於錢泳較之新出刻帖，更傾向於選擇舊刻作為底本。在當時，錢泳身處的金石碑帖圈中較多出現反對「輾轉摹勒」的刻帖、推崇「書丹原石」之碑的觀點，他自己也認同此說。雖然刻帖是謀生需要，但錢泳或為避免「輾轉摹勒」過多，而傾向於使用舊刻，這也是他在製作刻帖時的用心之處。

在對刻帖的質量進行評價時，最主要的兩大評價標準是「選帖」與「摹勒」。⁵²「選帖」反映了主事者的鑒別能力，包括是否選擇了有書法或文獻價值的法書上石、是否是善本上石、是否誤選了偽作等；「摹勒」反映了雙鉤者及刻工的水準，也包括石材或木材的選擇等，其水準主要體現在是否真實地再現了原作的書寫面貌。選刻皆精者自然是質量上乘的刻帖，但實際上完美的理想狀況是極難出現的，誤選偽作常難以避免，對於何者為善本亦是見解不一，至於如清初《快雪堂法書》的刻手劉光暘（字雨若）（生卒不詳，活躍於明末清初）這樣的傑出鐫刻

50（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頁 316。

51 錢泳在《履園叢話》中記載稱：「玄宗〈鶴鵠頌〉……謹案御刻《三希堂法帖》第二十七冊……」；「坡公書……孔氏玉虹樓所刻之小字〈表忠觀碑〉，全是惡筭……」（此處「孔氏玉虹樓所刻」即指《玉虹鑒真帖》）。參見（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頁 264、291。

52 這兩點可以從歷代文人學者對於刻帖質量的大量討論中見到，亦可集中從近代碑帖專家張伯英的刻帖評語中觀察到。

家也屬難得。因此，在現實考量下，刻帖能夠做到偽作較少、接近書寫者的風格面貌、摹刻質量相對較優即可稱之為「品質精良」。正如張伯英所言，錢泳的刻石風格「一味平軟」、⁵³「鈎勒古今人書，往往參以己意」，⁵⁴但錢泳的整體水準在清中期仍然是較高的，他「參以己意」大都在一定的限度內，且並非所有的刻帖都會以己意加以改動，因此張伯英也認可出自錢泳之手的碑帖「精美」。錢泳的選帖眼光雖時有人詬病，但至少在《福州帖》中表現出了較好的水準，加之其不錯的摹刻質量，因而《福州帖》可稱為「品質精良」。

四、《福州帖》的營銷情況及其原因分析

通過前文分析可知，《福州帖》出自碑帖專家錢泳之手，其擇帖、編排均頗見心思，其中的蔡襄書蹟雖有與現存墨蹟本差異較大者，但總體而言，在當時碑帖市場魚龍混雜的情況下，整部《福州帖》還是較好地體現了蔡襄書風的各個側面，尤其是與流傳較廣的《古香齋寶藏蔡帖》相較，其精良程度遠勝後者。就今日所能見到的資料來看，《福州帖》實為摹刻蔡襄法書品質最佳的一部專刻帖。

《福州帖》在摹刻之初就以商業銷售為目的，帖後附有錢泳及潘奕雋二跋，既敘述了刻帖情況，同時也是廣告語。錢泳的跋語全文為：

蔡忠惠公書本學顏平原，而結字取態實出大令，自元、明以來，為蘇、黃、米三家之冠，惜其真跡日稀，如隨珠和璧，不可得矣。每見類帖所收，如《渤海》、《墨池》、《停雲》、《快雪》，雖不一其家，而從未有專刻者。惟莆陽宋比玉臨本有古香齋〈茶錄〉、〈荔枝譜〉諸帖，究非真跡入石，況又為後人翻刻，漸失其真耶？嘉慶十九年冬，泳山居多暇，遂集公諸書，或墨蹟，或舊搨，凡宋氏已臨者槩不入石，命曰《福州帖》。將以寄呈制府汪稼門先生、中丞王南陔先生，傳之十閩，為後生家法，未始非翰墨之一助也。

這則跋語充滿的廣告意味不言自明，首先錢泳敘述了蔡襄的書學淵源並強調了蔡襄為「宋四家」之冠的說法，接著又言蔡襄真蹟難得、諸家刻帖雖有收錄但書蹟

53 張伯英，《張伯英碑帖論稿·釋文卷》，頁238。

54 張伯英，《張伯英碑帖論稿·釋文卷》，頁60。

零散。在這裡錢泳對於宋比玉即宋 的《古香齋寶藏蔡帖》作了一個極有誤導性的陳述，他先稱「從未有專刻者」，又稱「惟莆陽宋比玉臨本有古香齋〈茶錄〉、〈荔枝譜〉諸帖」，事實上《古香齋寶藏蔡帖》當然是蔡襄專刻帖，只是其中收有宋 的臨寫本，經錢泳敘述，則成了《古香齋寶藏蔡帖》「全為宋珏臨寫本，不僅不是真蹟入石，而且被後人多次翻刻」，其價值自然不高。這裡可以見到錢泳刻意貶低同類刻帖以抬高自家刻帖的目的。跋語的最後點明閩浙總督汪志伊（1743-1818）、福建巡撫王紹蘭之名，一方面是表明他與二位大員的交情，同時也以其名字作為背書，以求打開在福建的銷售之路。「傳之十閩，為後生家法」一句可見《福州帖》原初就是專為福建學人量身定作的，他希望這部帖能因福建先賢之名在閩中成功銷售。

錢泳還邀請了卸官歸田的學者潘奕雋為《福州帖》題跋，潘奕雋是錢泳多年好友，他的題跋也極盡稱讚之能事，他寫道：「君謨真跡絕少，而刻石佳者亦稀。茲金匱錢立群司馬所集，選擇既精，摹勒複審，洵為墨林珍秘，視宋氏所刻有過之無不及也」，⁵⁵亦為上佳之廣告語。

如前文所述，錢泳摹刻《福州帖》的同時還在替王紹蘭重摹〈碣石門刻石〉、縮刻〈石鼓文〉、五種秦刻石和〈熹平石經〉，王紹蘭對這數種刻石極為上心，因而兩人書信往來頗多。錢泳應是在某一封信割中提到了《福州帖》並請王紹蘭代為銷售，王紹蘭因兩人往來正多，便許諾錢泳替他代銷百部。在之後的某一封信中，王紹蘭改變了主意，他寫道：

蔡忠惠公書為宋四家之冠，大兄輯其遺跡鉤摹上石，使先賢妙墨煥然一新，此寔藝林盛事。前筭云刻成許寄百部，俾海濱流傳，知所向慕，具見嘉惠後學至意。第此間地僻俗陋，好事者少，恐一時難以分致，乞寄十部足矣。閩中好尚即此，可例其餘。大雅聞之，當為捧腹一噱耳。⁵⁶

王紹蘭將許諾的銷售數量從百部減為十部，可見錢泳原初的銷售計畫難以實行。之後王紹蘭在另一封給錢泳的信中寫道：「惠寄《福州帖》十一部及扁對各件……屢費清神……福帖留貯弟處，謹送上朱提二十兩，以為煙楮搨工之費，亦希莞

55 此時錢泳已捐得了「侯選布政司經歷」的頭銜，故被雅稱為「司馬」。

56 信見（清）錢泳輯，《蘭林集》，無頁碼。

納。囑交汪制軍、李方伯帖二分，均經轉送」，⁵⁷可見錢泳依王紹蘭前信所言，共寄出了十一部《福州帖》，除作例行禮品贈人外，獲得了二十兩銀子的收入，每部約得二兩銀子。這個售價在當時對於品質較好的新刻帖來說，屬於不錯的價格，⁵⁸應遠高於製作較劣的《古香齋寶藏蔡帖》。但由於整體銷量不高，如果錢泳在此單之外別無售出的話，不知是否能夠回本。

從時間來看，上引信件應寫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十一月以前，《福州帖》於前一年冬日完工，隨後錢泳即致信請王紹蘭代售。信中提到錢泳也致送「李方伯」一部刻帖，這位李方伯應為福建布政使李賡芸（1754-1817），他於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被誣下獄，次年正月在獄中自盡，之後汪志伊因導致下屬逼死李賡芸被革職，王紹蘭亦因附和汪志伊同被革職，從此兩人告別官場。由此可知，王紹蘭能替錢泳代售《福州帖》的時間僅有十個月左右，除去兩人信件往還和寄送刻帖的時間，真正的代售期極為有限。從目前國內外能搜尋到的收藏資訊來看，收藏《福州帖》的較為少見，在清代文獻及近現代學者的討論中，除了錢泳的著述外，在容庚《叢帖目》對之著錄以前鮮見有人提到《福州帖》。清末民初的歐陽輔曾在著錄碑帖時言：「《古香齋帖》……刻既不精，拓手亦非良工，所得所見皆一律相似，殊不足觀，匯刻君謨書別無所聞，故存之以備一家。」⁵⁹由此可見《福州帖》並未廣泛流傳，因而鮮為人知。嘉慶二十二年（1817）汪志伊和王紹蘭的獲罪革職，極可能就中斷了《福州帖》的銷路，這件震動朝野的大案使得這兩人成了福建官場的污點，而錢泳在題跋中提及兩人姓名之本意是為了促進銷售，結果卻反成了阻礙。錢泳在王紹蘭之後是否還通過別的手段來銷售《福州帖》已難確知，但他如果不去掉帖後題跋，則很難再廣泛銷售，更不用說在主要目標地福建進行銷售了。錢泳也有可能在王紹蘭去官後將《福州帖》中的刻帖拆分銷售，而不再以整部帖的形式售賣，但如此一來，他以「蔡襄專刻帖」為名目來吸引買家的願望也落了空。

57 信見（清）錢泳輯，《蘭林集》，無頁碼。

58 錢泳曾經以一兩多至四兩不等的價格出售過十六卷的《詒晉齋法書》。《玉虹鑒真帖》為曲阜衍聖公族人孔繼涑刻，他曾以十三兩一錢五分的價格出售過八種刻帖，每種約一卷，售價高於錢泳刻帖。與錢泳處在同一金石摹刻圈的趙魏曾摹刻家藏趙孟頫單件作品出售，僅售二錢一本。參見薛龍春，〈十八世紀後期文化商品的價格——以黃易的朋友圈為中心〉，《中國書法》，2017年9月，頁158-173。

59 歐陽輔纂輯，《集古求真》（江西：開智書局，1923），卷13，頁7。

那麼，在《福州帖》的最佳銷售期嘉慶二十一年時，王紹蘭為何將許諾的數量從百部減至十部？甚至這十部也帶有很強的人情意味。王紹蘭在信中給出的理由是「第此間地僻俗陋，好事者少」，也就是說福建人不好此道，購買刻帖的意願不強。確實，與福建長期興旺的刻書業相比，刻帖的規模要小得多，不僅種類上遠不及江南地區，品質也相差很遠，這或與福建缺少合適的石料有關，但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福建當地的碑帖市場、尤其是精良碑帖的市場與江南相較確實不夠繁榮。

除了王紹蘭信中的表面理由外，或許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在習稱的「宋四家」之中，蔡襄年代最早，與蘇、黃、米三家有著書法理念的不同，蔡襄廣臨古法，整體書風趨於平和溫雅，而蘇、黃、米三家則個性鮮明、各有創新，在書法史中更受人矚目。蔡襄書法在宋時被蘇軾等人推崇，自宋以來常被稱許為「宋朝第一」，這也是錢泳題跋中所稱「為蘇、黃、米三家之冠」的淵源，但蔡襄書法雖在歷代書論中常被復古者推崇，其實際影響力卻要小於蘇、黃、米三家。錢泳本人曾評價蔡襄「人品醇正，字畫端方」，但以為「宋四家皆不可學，學之輒有病，蘇、黃、米三家尤不可學，學之不可醫也」，⁶⁰ 又稱「蔡書不可學者過於拘」，⁶¹ 可見錢泳認為較之蘇、黃、米，蔡襄書法雖毛病稍少，但亦非理想的臨池範本——由此更加確定《福州帖》之刻純出於商業動機，實為看中蔡襄刻帖在福建可能的銷路。錢泳好友福州籍學者梁章鉅則認為：「宋四家蘇、黃、米皆可學，惟蔡不必學，蓋蔡書尚未變盡唐人面貌，學蔡則不如徑學唐人。」⁶² 錢泳與梁章鉅對於蘇、黃、米三家是否可學存在分歧，卻一致認為蔡襄書法不是臨池的理想範本，這二人的看法頗有代表性。梁章鉅是福州人，卻未因蔡襄是福建先賢且澤惠過福州而對其書法有所抬愛，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福建籍的許多書家身上。清中期的黃錫蕃（1761-1851）著有《閩中書畫錄》，其中記載有書學淵源的清代書家（從順治朝到乾隆朝）共二十八人，情況如表一所示，其中並無一人被描述為取法蔡襄，記載雖難免有不準確之處，但由此至少可知福建籍書家在臨池擇帖時並無偏向鄉賢蔡襄的情況。梁章鉅曾記載道：「吾鄉學行書多從映刻〈天冠山帖〉入手，操觚家

60（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頁 291。

61（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頁 292。

62（清）梁章鉅，《退庵隨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1197 冊，卷 22，頁 459。

案頭輒有一本，不知此帖是偽本，罅漏顯然，字體側峭，神味淺薄，何足以供臨摹」，⁶³〈天冠山帖〉掛名趙孟頫，清中期時趙書全國風行，可見福州亦不例外。在這種習書環境下，《福州帖》雖然製作精良，但希望其能在福建熱銷恐不現實。

表一 《閩中書畫錄》中清代福建書家書學淵源情況表

姓名	籍貫	書學淵源描述	卷數
許 友	侯官	「酷慕米襄陽」	卷九
郭鼎京	福清	「筆筆仿歐陽率更」	卷九
林鼎複	長樂	「書法臨晉漢」	卷九
黃 轍	莆田	「書法出入黃米間」	卷九
吳養浩	莆田	「手摹醴泉銘」	卷九
呂天貺	甌寧	「楷書得黃庭遺法」	卷九
郭 雍	福清	「書法規摹鐘王」	卷十
宋慶曾	莆田	「書摹大小王」	卷十
張 燦	惠安	「字出入黃庭經，又于康盤峰中丞家購求閔文逸、王稚宜真跡日夜臨摹」	卷十
林 衡	侯官	「工詩歌古文詞及二王書法」	卷十
張天麟	侯官	「工王柳懷素書法」	卷十
林 泉	晉江	「得鐘王法」	卷十
林 寵	閩縣	「楷書仿歐陽詢而間以黃庭筆意」	卷十
謝天游	閩縣	「工書畫有米芾倪瓚筆法」	卷十一
危聯箕	光澤	「解鐘王書法」	卷十一
郭 徽	晉江	「書法摹仿右軍」	卷十一
丁 燧	晉江	「草書仿佛懷素」	卷十一
陳蕙芳	古田	「臨池尤得歐陽率更筆妙」	卷十一
魏 萬	龍溪	「學顏魯公」	卷十一
黃 巖	龍溪	「草學懷素」	卷十一

63 (清)梁章鉅，《退庵隨筆》，卷22，頁459。

姓名	籍貫	書學淵源描述	卷數
周紹龍	閩縣	「書法精妙，出入歐蘇」	卷十二
鄭 溥	海澄	「草書如春蚓秋蛇，直追張旭懷素一派」	卷十二
陳紹芳	晉江	「工詩詞古文顏柳書法」	卷十二
黃 慎	寧化	「字學懷素」	卷十二
張捷春	閩縣	「字仿右軍」	卷十二
謝士驥	閩縣	「善草書、波折清道，得涪翁法」「善書法，工懷素」	卷十二
黎良行	寧化	「楷法二王」	卷十二
艾友竹	建寧	「書法董其昌」	卷十二

資料來源：（清）黃錫蕃，《閩中書畫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068冊。

照王紹蘭與錢泳的現存信件推斷，王紹蘭極可能是先收到錢泳《福州帖》中的部分拓樣或先收到一部完整的《福州帖》樣本之後，再函告錢泳將許諾代銷的數額由百部減至十部。從王紹蘭的相關資料來看，他並未在書法上有何特殊造詣，也未見有嗜好古人法書的記載，他的主要成就和治學興趣在於經史考證，因此他很可能在對〈石鼓文〉、秦刻石及漢石經充滿了熱情的同時，卻對蔡襄法書興趣不大，加之瞭解到福建市場有一定的售賣難度，或許還有其他不便直說的原因，總之，王紹蘭最終婉拒了事。

五、結語

碑帖鐫刻家錢泳借著與福建巡撫王紹蘭之間有著一系列摹刻、縮刻上古石刻委託的契機，自行撰刻了一部蔡襄法書專帖，名之為《福州帖》並意欲托王紹蘭在福建銷售。《福州帖》的選帖和摹刻質量在錢泳當時的條件下已屬較優，它對蔡襄的書風進行了較為全面且大體準確的反映，其品質要遠勝過當時流傳較廣的明人宋 所刻的《古香齋寶藏蔡帖》。《福州帖》售價約為二兩銀子一部，較之品質較差的《古香齋寶藏蔡帖》應當昂貴不少，或是福建精英文人對於高端蔡襄法書刻帖並無太多興趣，加之王紹蘭本人重視古碑的考證價值多過古帖的書法價值，他最終只替錢泳「銷售」了十部。隨著《福州帖》題跋中特意提及的閩浙總督汪志伊和福建巡撫王紹蘭因布政使李賡芸的冤獄而獲罪革職，《福州帖》在福建的銷

路極可能就此斷絕，從而造成了此帖雖然質量較佳，卻一直鮮為人知的局面。

《福州帖》作為清中期刻帖熱潮中的個例，其刻帖緣起、底本來源和營銷情況都反映了大量的時代細節。錢泳作為一位未獲正式科考功名的底層文人，憑藉著碑帖鐫刻技藝、書法能力和一定的金石學知識能夠與眾多王公貴族和高官文士進行交往，正是因為當時的文化圈中盛行著對金石法帖的濃厚興趣。如王紹蘭這樣的地方大員有著摹刻名碑從而為自己留名的強烈願望，同時還有著玩賞縮刻版古碑的書齋雅興。作為官員事務繁忙，錢泳這樣有著一定文化水準的碑帖鐫刻專家正好可以替他全程打理如選石、選底本、摹刻、題跋書撰等相應刻石事務，保證最終成品的優質效果。在這個過程中，錢泳也獲得了一定的對話權，進而可以請求社會地位遠高於自己的一省巡撫替自己銷售刻帖。錢泳作為當時金石書法圈中的活躍人士，與阮元、翁方綱等關心碑帖的學者多有交往，亦深知當時刻帖市場中的「輾轉摹勒」之弊，他因生計之故在撰帖售賣的同時，也極為注重刻帖的底本選擇，在能力範圍內，錢泳還是盡量以自己的眼光來選擇墨蹟本及舊拓本上石，並敢於否認翁方綱的鑒帖眼光，從這些行為中可以看到錢泳在牟利的同時，也極意保證刻帖的品質，並有著一份文人的自我堅持。乾嘉時期臨摹漢唐碑刻的風氣頗為興盛，同時傳統帖學仍佔據主流，錢泳在以摹刻的方式複製、重製古碑的同時，也在進行著大量的刻帖活動，集刻蔡襄法書在福建銷售的主意體現著市場中的刻帖人創造商機的敏銳思路。但蔡襄書法雖好，對於尋求個性的人而言，不如蘇、黃、米，對於崇古的人而言，不如直接上臨二王或唐碑，在這種情況下，若是法帖售價稍昂，則有滯銷的可能，因此儘管福建士人歷來尊崇蔡襄，品質較好但售價不低的《福州帖》卻沒能打開銷售局面。錢泳將售帖管道寄託在王紹蘭身上，體現他在此走的不是民間坊市通道，而是意欲以行政權力來為這部刻帖背書。在當時的環境中，官員替友朋居中售賣文物古籍書畫的情形並不稀見，錢泳在此之前與眾多高官的交往讓他通曉此道，他在《福州帖》的題跋中直接點明地方大員的姓名，對行政權力的借用之心表露無遺。只可惜官場動盪常出人意料，福建兩位督撫的雙雙革職使得這場意欲依靠行政權力的營銷就此告終。

錢泳作為極有商業眼光的碑帖鐫刻者，在一生中曾製作出多種影響廣泛的碑帖產品，如他集刻成親王永瑒書蹟所成的《詒晉齋法書》及《詒晉齋巾箱帖》便暢銷於各文化階層中，坊市上還出現了大量的仿冒射利產品。錢泳自身擅寫隸書，他製作了一系列由自己書寫的漢隸產品，如《攀雲閣臨漢碑》、《縮本漢碑》、

《問經堂帖》等，在市場中甚受歡迎，⁶⁴ 影響及於海外，播及後世。乾嘉時期以永瑒書蹟為代表的「帖學名家書法」與臨習漢碑的「習碑風尚」是造成上述碑帖產品能獲精英士人認可並風靡市場的重要原因。此外，永瑒為當代人，書蹟未經歷史的「輾轉摹勒」；漢碑系列碑帖為錢泳自書，大多根據現有漢碑拓本臨寫，亦無書蹟真偽問題。與此相比，蔡襄書蹟的集刻便無法避免「輾轉摹勒」的問題，由上文所述的《福州帖》底本探源可知，許多書蹟在不同刻帖中有著不同面貌的呈現，在沒有可靠墨蹟本對勘的情況下，孰真孰偽實難辨清，這在踐行乾嘉考據實學的士人眼中，其可靠程度不能不大量存疑，加之蔡襄在上層精英圈中亦非第一等流行書家，因而《福州帖》最終遇冷。《福州帖》雖是錢泳的用心之作，卻可能是他碑帖生涯中的「商業失敗」品，雖然選帖與摹刻在同期的碑帖市場中已屬上乘，但因為種種客觀原因而難以大量流通。失敗的《福州帖》反而給今人提供了觀察清中期碑帖市場及其生態的一個生動窗口，它的摹刻、銷售始末及過程中的相關人事和商業考量提供了一個細節豐富的生動例證，有助於進一步認識清中期的刻帖行為、碑帖市場、書法風尚及不同階層文化人士之間的交流往來。

64 參見盧慧紋，〈碑與帖的交會——錢泳《攀雲閣帖》在清代書史中的意義〉，《美術史研究集刊》，31期（2011.9），頁205-276。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宋)蔡襄,〈行書山堂帖冊〉,《中國書法》,2015年11月,頁76-77。
- (清)王昶,《金石萃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88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金武祥,《粟香五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1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胡源、褚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冊122,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45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翁方綱撰,沈津輯,《翁方綱題跋手割集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 (清)高世奇,《江村銷夏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2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曹振鏞等奉敕修,《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四)》,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梁同書,《頻羅庵遺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353,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梁章鉅,《退庵隨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19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陳榮仁,《閩中金石略》,收入《歷代碑誌叢書》,冊2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 (清)黃錫蕃,《閩中書畫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06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 (清)趙懷玉撰,《亦有生齋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419,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潘衍桐輯,《兩浙輶軒續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68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錢泳撰,《寫經樓金石目》,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刻本。
- (清)錢泳撰,《寫經樓金石目》未刊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述祖德堂抄本。
- (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
- (清)錢泳輯,《蘭林集》,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稿本。

近代論著

-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法書全集第6卷·宋1》，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 仇春霞，〈蔡襄〈虹縣帖〉〈入春帖〉〈持書帖〉人物故實考辨〉，《中國書法》，2021年7月，頁136-137。
- 方傳鑫編，《蘇軾天際烏雲帖》，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
- 王俊輝，〈幸有斯人獨皮藏〉，《出版人》，2017年第3期，頁42-43。
- 衣若芬，〈蘇軾〈天際烏雲帖〉詮解〉，《文學評論》，2015年4期，頁211-220。
- 林司洋、新井惠理佳，〈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蔡襄〈謝賜御書詩表〉墨蹟本之探討〉，《故宮文物月刊》，421期，2018年4月，頁77-87。
- 容庚，《叢帖目》，北京：中華書局，2012。
- 張多強，〈《三希堂法帖》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 張伯英，〈張伯英碑帖論稿·釋文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
- 張愛民、何效義，〈唯美的典範：〈嶧山刻石〉藝術簡述〉，《中國書法》，2015年5月，頁48-57。
- 梁新順主編，《秋碧堂法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
- 陳雅飛，〈乾嘉幕府的碑帖風尚——以錢泳為視角〉，收入莫家良、陳雅飛編，《楹聯·帖學·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8，頁147-180。
- 程存潔主編，《福州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程存潔主編，《翰香館法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程存潔主編，《職思堂法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蔡襄卷》，北京：榮寶齋，1995。
- 歐陽輔纂輯，《集古求真》，江西：開智書局，1923。
- 潛堂主編，《中華傳世名帖·冊二》，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2011。
- 盧慧紋，〈碑與帖的交會——錢泳《攀雲閣帖》在清代書史中的意義〉，《美術史研究集刊》，31期，2011年9月，頁205-276。
- 盧慧紋，〈縮率更魯公於分釐之間，運龍跳虎臥於格式之內——錢泳的《縮臨唐碑》與清代楷書風尚〉，收入莫家良主編，《合璧聯珠三——樂常在軒藏清代楹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2016，頁18-29。
- 薛龍春，〈十八世紀後期文化商品的價格——以黃易的朋友圈為中心〉，《中國書法》，2017年9月，頁158-173。
- 東京國立博物館，《顏真卿：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東京：毎日新聞社，2019。

馬成芬，〈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問経堂法帖』の受容〉，《文化交渉 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学院生論集》，4号，2015年2月，頁165-176。

網路資料

北京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https://www.dpm.org.cn/explore/collections.html>，檢索日期：2022年7月4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資料典藏檢索》<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檢索日期：2022年7月4日。

Harvard Library. “Harvard Digital Collections.” Accessed July 4, 2022. <https://library.harvard.edu/digital-collections>.

圖版出處

- 圖 1-1 錢泳摹刻徐鉉臨本（傳）秦〈碣石門刻石〉原碑（局部），鎮江焦山碑刻博物館藏。圖版為作者自攝。
- 圖 1-2 長安本〈嶧山刻石〉原碑（局部），西安碑林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張愛民、何效義，〈唯美的典範：〈嶧山刻石〉藝術簡述〉，《中國書法》，2015 年 5 月，頁 49。
- 圖 2 錢泳摹刻徐鉉臨本（傳）秦〈碣石門刻石〉原碑後王紹蘭題跋，鎮江焦山碑刻博物館藏。圖版為作者自攝。
- 圖 3 蔡襄，〈自書詩稿〉墨蹟本（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handwriting/228526.html>，檢索日期：2022 年 7 月 4 日。
- 圖 4 《秋碧堂法書·蔡襄自書詩稿》拓本影印本（局部）。圖版取自梁新順主編，《秋碧堂法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
- 圖 5-1 《福州帖·蔡襄自書詩稿》拓本影印本（局部）。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福州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圖 5-2 《經訓堂法書·蔡襄自書詩稿》拓本（局部），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圖版取自 [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5027347\\$80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5027347$80i)，檢索日期：2022 年 7 月 4 日。
- 圖 6 蔡襄〈自書詩稿〉摹刻情況對比，所採用圖版同前揭，全表為作者自製。
- 圖 7-1 蔡襄，〈謝賜御書詩表〉墨蹟本（局部），日本東京台東區書道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顏真卿：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東京：毎日新聞社，2019，頁 235。
- 圖 7-2 《三希堂法帖·蔡襄謝賜御書詩表》拓本（局部），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圖版取自 [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0222012\\$350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0222012$350i)，檢索日期：2022 年 7 月 4 日。
- 圖 7-3 《福州帖·蔡襄謝賜御書詩表》拓本影印本（局部）。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福州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圖 7-4 《聽雨樓帖·蔡襄謝賜御書詩表》拓本（局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圖版為北京大學圖書館提供。
- 圖 8-1 《福州帖·蘇軾天際烏雲帖》拓本影印本（局部）。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福州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圖 8-2 《快雪堂法書·蘇軾天際烏雲帖》拓本（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8-3 蘇軾，〈天際烏雲帖〉（局部），翁方綱舊藏本。圖版取自方傳鑫編，《蘇軾天際烏雲帖》，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
- 圖 9 《福州帖·春暄帖》拓本影印本（局部）。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福州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圖 10-1 蔡襄，〈郊燔帖〉墨蹟本（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蔡襄卷》，北京：榮寶齋，1995，頁 105-106。
- 圖 10-2 《福州帖·蔡襄郊燔帖》拓本影印本（局部）。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福州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圖 10-3 《快雪堂法書·蔡襄郊燔帖》拓本（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0-4 《翰香館法書·蔡襄郊燔帖》拓本影印本（局部）。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翰香館法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圖 10-5 《古香齋寶藏蔡帖·蔡襄郊燔帖》拓本（局部），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圖版取自 [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5027329\\$6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5027329$6i)，檢索日期：2022 年 7 月 4 日。
- 圖 11-1 蔡襄，〈紆問帖〉墨蹟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法書全集第 6 卷·宋 1》，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 124-125。
- 圖 11-2 《福州帖·蔡襄紆問帖》拓本影印本。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福州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圖 12 《福州帖·蔡襄誌文帖》拓本影印本。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福州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圖 13-1 蔡襄，〈陶生帖〉墨蹟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3-2 《三希堂法帖·蔡襄陶生帖》拓本（局部），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圖版取自 [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0222012\\$341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0222012$341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0222012\\$342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0222012$342i)，檢索日期：2022 年 7 月 4 日。
- 圖 14-1 《福州帖·蔡襄陶生帖》拓本影印本。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福州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圖 14-2 《渤海藏真帖·蔡襄陶生帖》拓本，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圖版取自 [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3505220\\$54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3505220$54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3505220\\$55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3505220$55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3505220\\$56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3505220$56i)，檢索日期：2022 年 7 月 4 日。
- 圖 15-1 蔡襄，〈持書帖〉墨蹟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仇春霞，〈蔡襄〈虹縣帖〉〈入春帖〉〈持書帖〉人物故實考辨〉，《中國書法》，2021 年 7 月，頁 136-137。
- 圖 15-2 《三希堂法帖·蔡襄持書帖》拓本，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圖版取自 [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0222012\\$359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0222012$359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0222012\\$360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0222012$360i)，檢索日期：2022 年 7 月 4 日。
- 圖 16-1 《福州帖·蔡襄持書帖》拓本影印本。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福州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圖 16-2 《快雪堂法書·蔡襄持書帖》拓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7-1 蔡襄，〈連日山中帖〉墨蹟本（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7-2 《福州帖·蔡襄連日山中帖》拓本影印本（局部）。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福州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圖 18-1 蔡襄，〈山堂書七絕二首〉墨蹟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宋）蔡襄，〈行書山堂帖冊〉，《中國書法》，2015 年 11 月，頁 76-77。
- 圖 18-2 《玉虹鑒真帖·蔡襄山堂書七絕二首》拓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圖版由北京大學圖書館提供。
- 圖 19-1 《福州帖·蔡襄山堂書七絕二首》拓本影印本。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福州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圖 19-2 《渤海藏真帖·蔡襄山堂書七絕二首》拓本，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圖版取自 [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3505220\\$65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3505220$65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3505220\\$66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3505220$66i)，檢索時間：2022 年 7 月 4 日。
- 圖 20-1 蔡襄，〈遠蒙帖〉墨蹟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法書全集第 6 卷·宋 1》，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 170。
- 圖 20-2 《三希堂法帖·蔡襄遠蒙帖》拓本，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圖版取自 [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0222012\\$354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0222012$354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0222012\\$355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0222012$355i)，檢索日期：2022 年 7 月 4 日。
- 圖 21 《福州帖·蔡襄遠蒙帖》拓本影印本。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福州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圖 22-1 蔡襄〈大研帖〉墨蹟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2-2 《福州帖·蔡襄大研帖》拓本影印本。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福州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圖 23-1 蔡襄，〈謝郎帖〉墨蹟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3-2 《福州帖·蔡襄謝郎帖》拓本影印本。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福州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圖 24-1 《渤海藏真帖·蔡襄謝郎帖》拓本，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圖版取自 [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3505220\\$61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3505220$61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3505220\\$62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3505220$62i)，檢索日期：2022 年 7 月 4 日。
- 圖 24-2 《三希堂法帖·蔡襄謝郎帖》拓本，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圖版取自 [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0222012\\$345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0222012$345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0222012\\$346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0222012$346i)，檢索日期：2022 年 7 月 4 日。
- 圖 25-1 蔡襄，〈門屏帖〉墨蹟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潛堂主編，《中華傳世名帖·冊二》，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2011，頁 139。

- 圖 25-2 《福州帖·蔡襄門屏帖》拓本影印本。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福州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圖 26-1 《福州帖·縣君帖》拓本影印本。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福州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圖 26-2 《渤海藏真帖·蔡襄縣君帖》拓本，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圖版取自 [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3505220\\$58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3505220$58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3505220\\$59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3505220$59i)，檢索日期：2022 年 7 月 4 日。
- 圖 27-1 《翰香館法書·蔡襄縣君帖》拓本影印本（局部）。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翰香館法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圖 27-2 《職思堂法書·蔡襄縣君帖》拓本影印本（局部）。圖版取自程存潔主編，《職思堂法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The Cross-Clas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 in the Making of Model Calligraphy in the Middle Qing Dynasty: The Making and Selling of *Fuzhoutie**

Yao, Ling**

Abstract

Fuzhoutie is a special set of model calligraphy for Cai Xiang's works, which was compiled and engraved by the stele and model-calligraphy making expert Qian Yong in the Jiaqi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but has attracted little attention in history. Through analysis of both literature and image materials, this paper provides details of why and how the *Fuzhoutie* was made and sold, observes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 low-ranking literary man Qian Yong and the Fujian governor Wang Shaolan. The reason why *Fuzhoutie* is of good quality but of less influence is also discussed. This case study brings together valuable details of the industry on making model calligraphy in the middle Qing dynasty, and also enh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socio-cultural exchange patterns relating to stele and model calligraphy making in the middle Qing dynasty.

Keywords: *Fuzhoutie*, middle Qing dynasty, model calligraphy making, Cai Xiang, Qian Yong, Wang Shaolan

* Received: 20 August 2021; Accepted: 22 April 2022

** Lecturer, School of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上：圖 1-1 錢泳摹刻徐鉉臨本（傳）秦〈碣石門刻石〉原碑（局部） 鎮江焦山碑刻博物館藏
下：圖 1-2 長安本〈嶧山刻石〉原碑（局部）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圖 2 錢泳摹刻徐鉉臨本（傳）秦〈碣石門刻石〉原碑後王紹蘭題跋 鎮江焦山碑刻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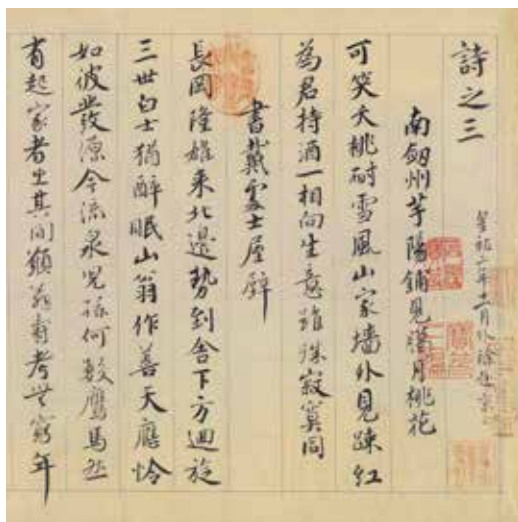


圖3 蔡襄〈自書詩稿〉墨蹟本（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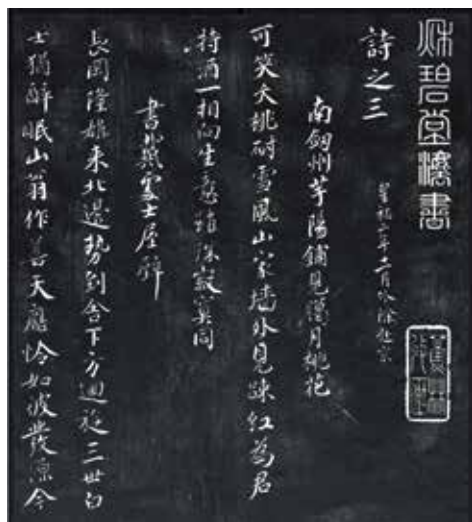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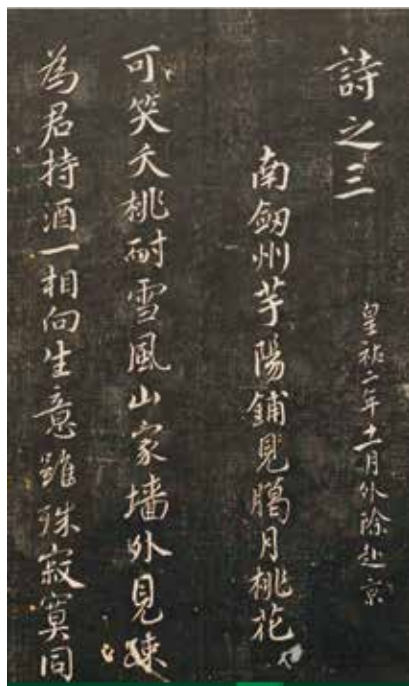


圖4 《秋碧堂法書·蔡襄自書詩稿》拓本影
印本（局部）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3 版



左：圖 5-1 《福州帖·蔡襄自書詩稿》拓本影印本（局部） 廣東人民
出版社 2016 版



右：圖 5-2 《經堂法書·蔡襄自書詩稿》拓本（局部） 哈佛大學圖
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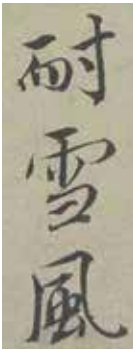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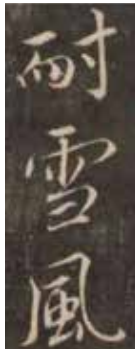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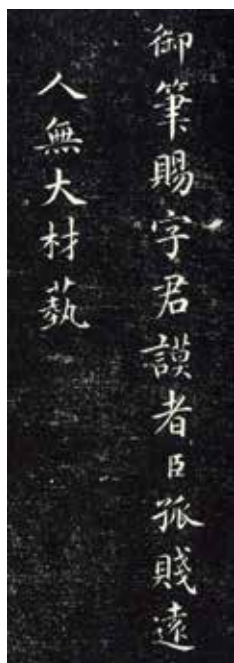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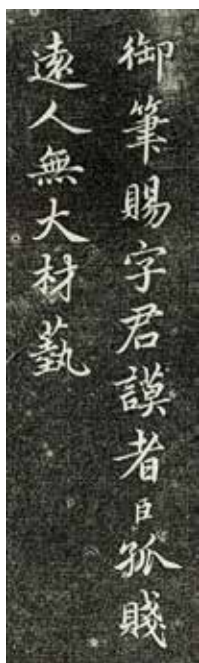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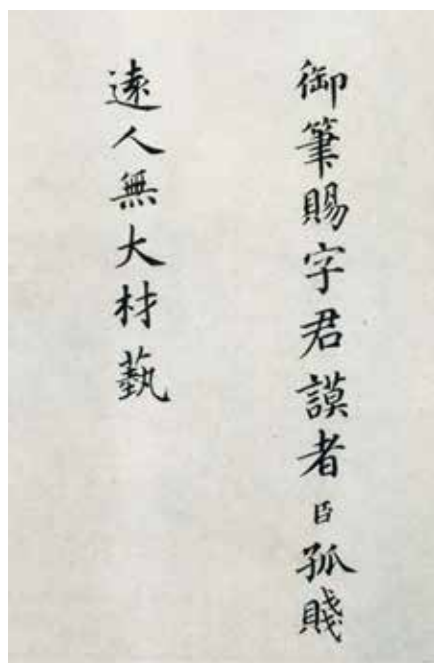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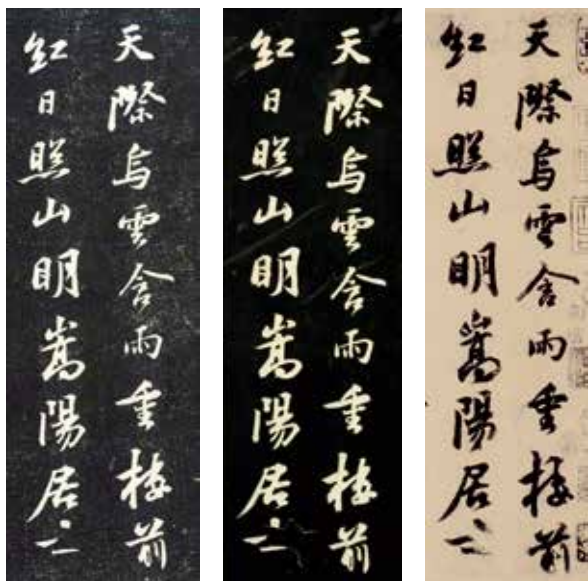
蔡襄〈自書詩稿〉摹刻情況對比			
墨蹟本	《秋碧堂法書》本	《經訓堂法書》本	《福州帖》本
			
			
			

圖6 蔡襄〈自書詩稿〉摹刻情況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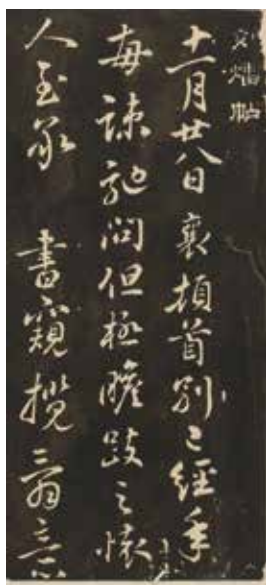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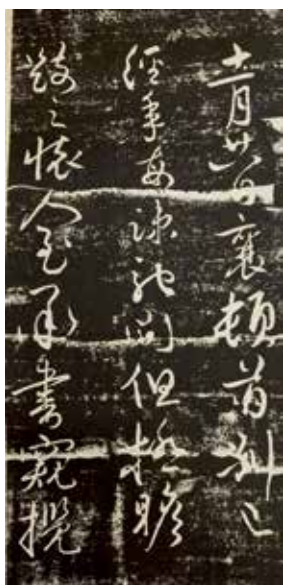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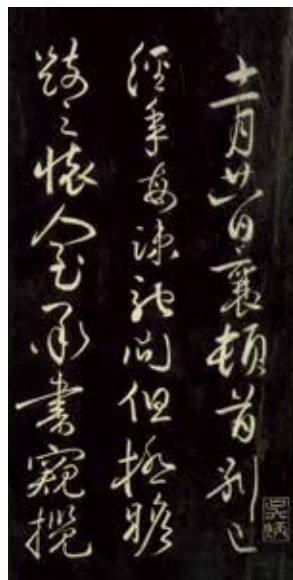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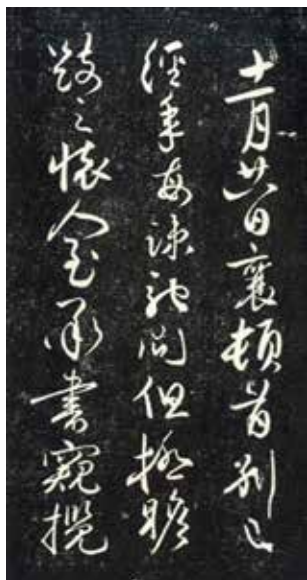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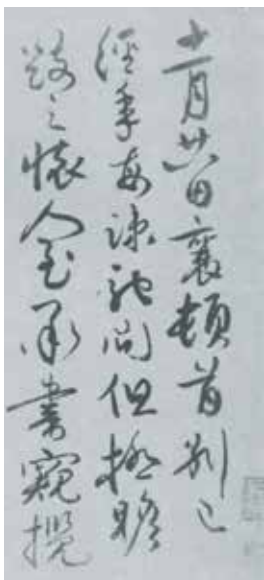
- 上：圖 7-1 蔡襄〈謝賜御書詩表〉墨蹟本（局部） 日本東京台東區書道博物館藏
 下左：圖 7-2 《三希堂法帖·蔡襄謝賜御書詩表》拓本（局部）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下中：圖 7-3 《福州帖·蔡襄謝賜御書詩表》拓本影印本（局部）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版
 下右：圖 7-4 《聽雨樓帖·蔡襄謝賜御書詩表》拓本（局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左：圖 8-1 《福州帖·蘇軾天際烏雲帖》拓本影印本（局部）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版
中：圖 8-2 《快雪堂法書·蘇軾天際烏雲帖》拓本（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圖 8-3 〈蘇軾天際烏雲帖〉（局部），翁方綱舊藏本 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2 版



圖 9 《福州帖·春暄帖》拓本影印本（局部）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版



- 上行：左：圖 10-1 蔡襄〈郊燔帖〉墨蹟本（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上行：中：圖 10-2 《福州帖·蔡襄郊燔帖》拓本影印本（局部）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版
 上行：右：圖 10-3 《快雪堂法書·蔡襄郊燔帖》拓本（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下行：左：圖 10-4 《翰香館法書·蔡襄郊燔帖》拓本影印本（局部）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版
 下行：右：圖 10-5 《古香齋寶藏蔡帖·蔡襄郊燔帖》拓本（局部）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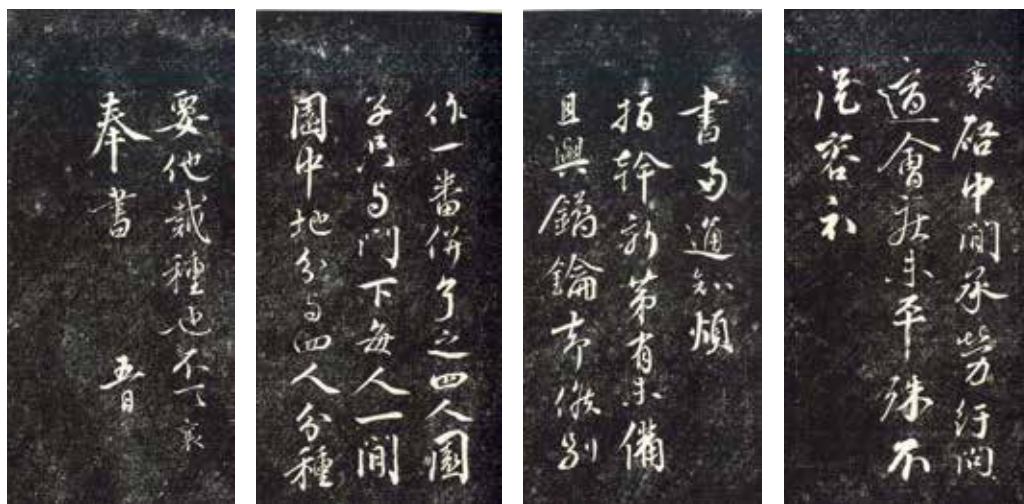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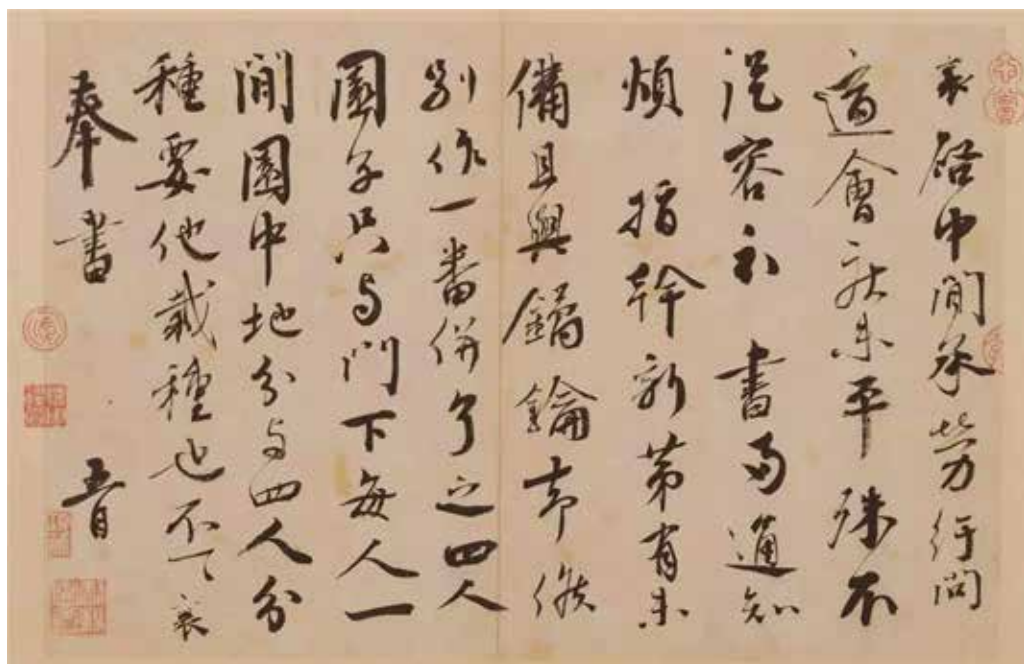


圖 11-1 蔡襄〈紆問帖〉墨蹟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1-2 《福州帖·蔡襄紆問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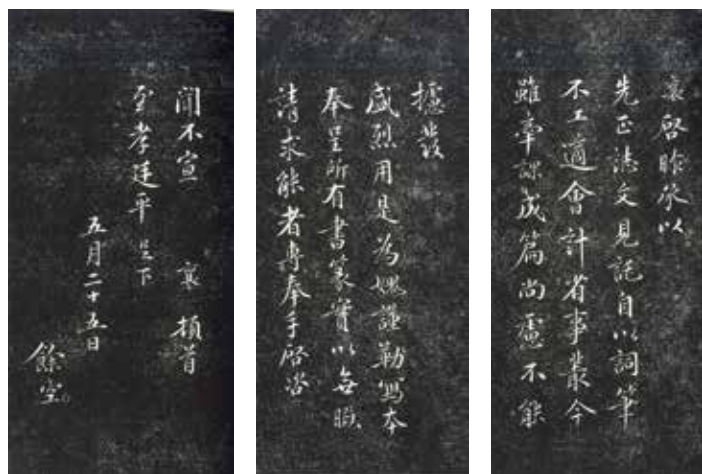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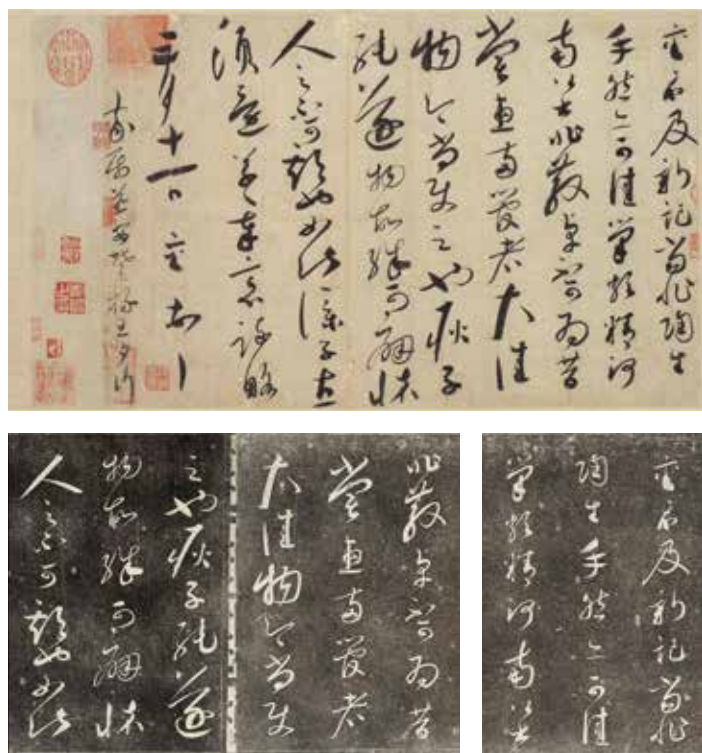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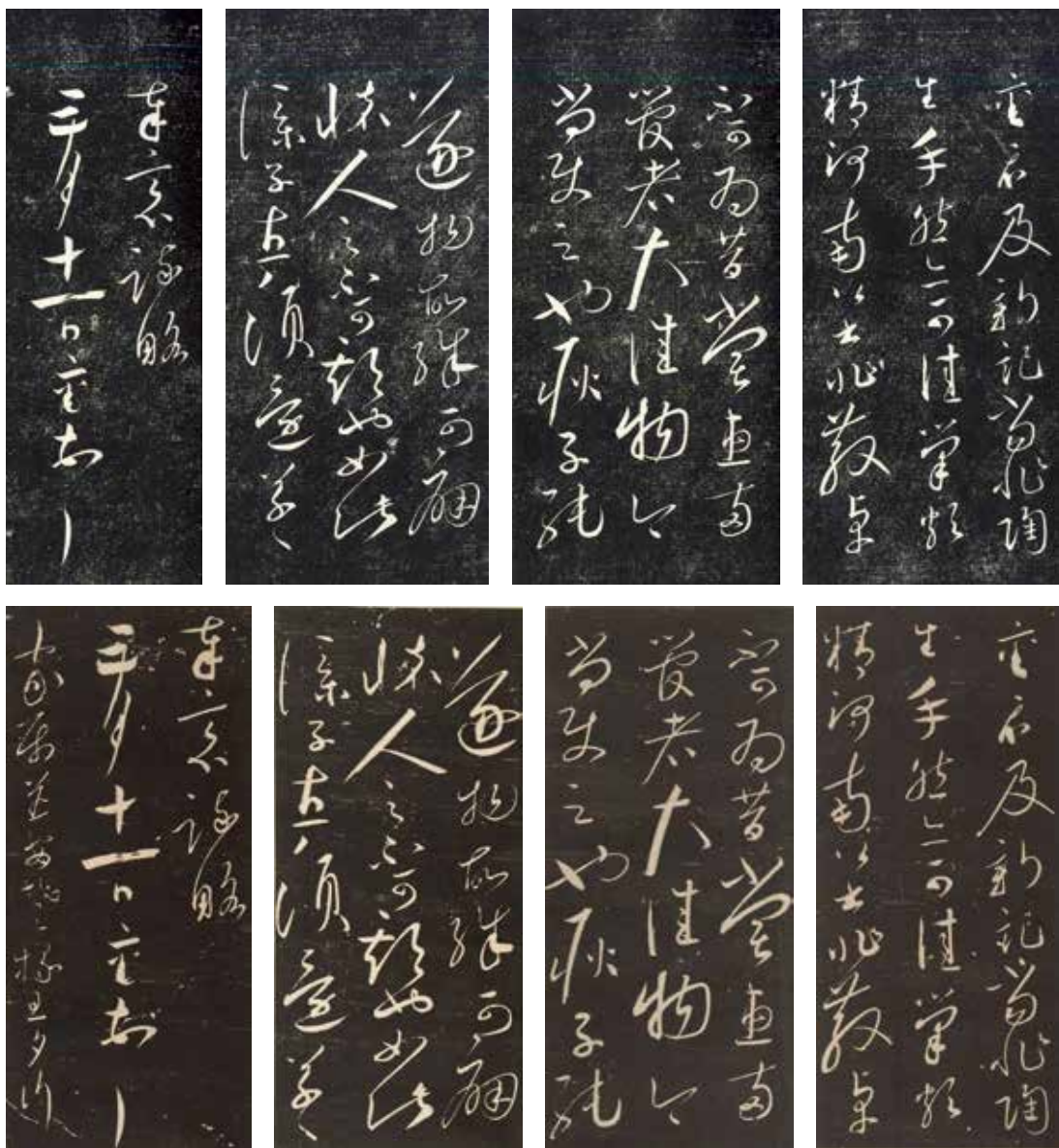


圖 12 《福州帖·蔡襄誌文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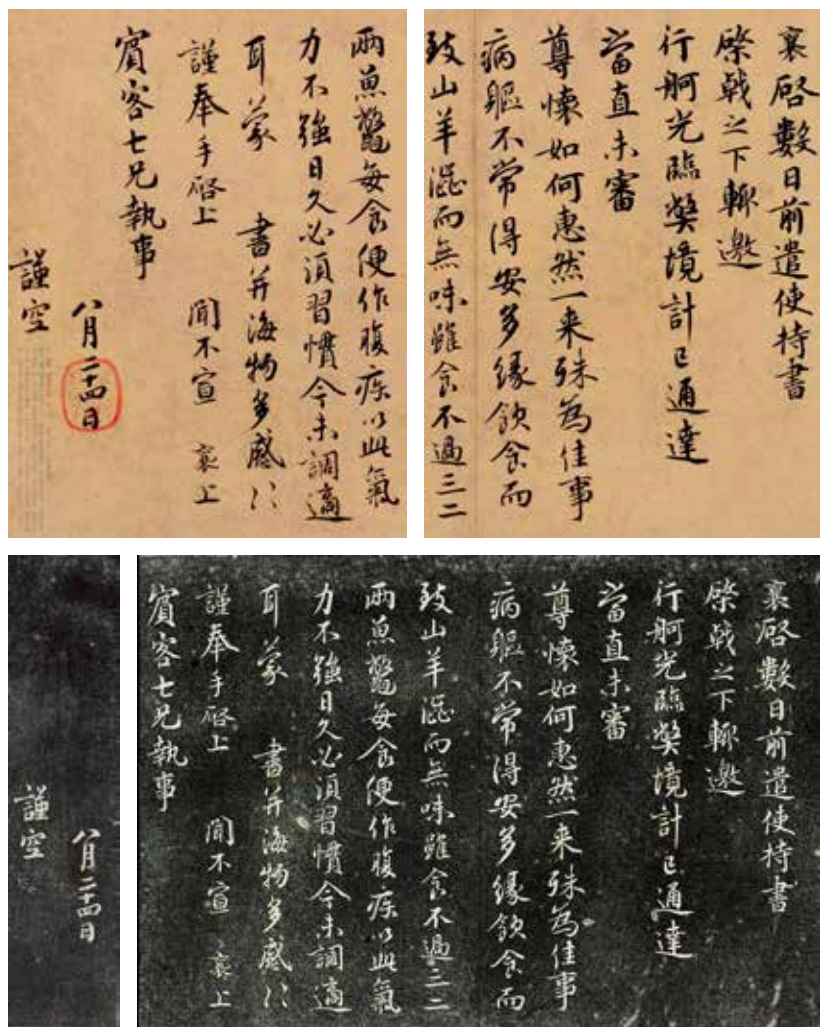


上：圖 13-1 蔡襄〈陶生帖〉墨蹟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下：圖 13-2 《三希堂法帖·蔡襄陶生帖》拓本（局部）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上：圖 14-1 《福州帖·蔡襄陶生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版

下：圖 14-2 《渤海藏真帖·蔡襄陶生帖》拓本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上：圖 15-1 蔡襄〈持書帖〉墨蹟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下：圖 15-2 《三希堂法帖·蔡襄持書帖》拓本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上：圖 16-1 《福州帖·蔡襄持書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版
下：圖 16-2 《快雪堂法書·蔡襄持書帖》拓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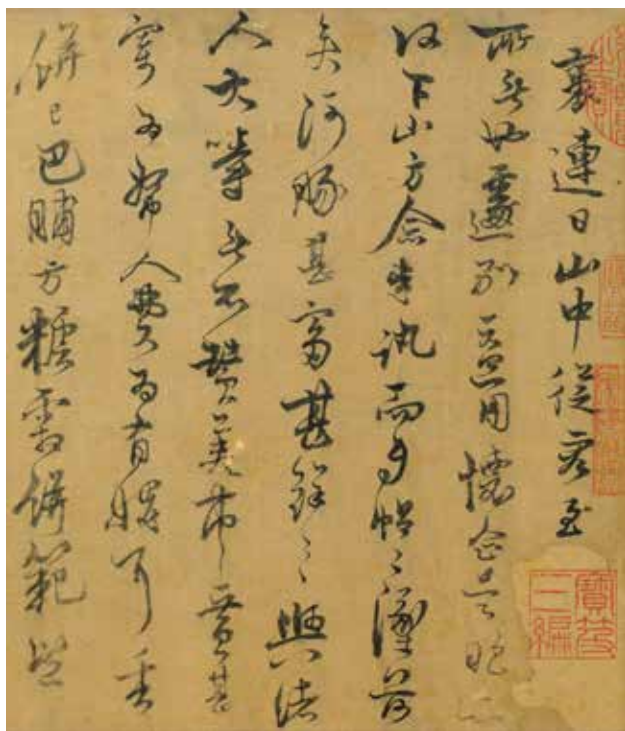


圖 17-1 蔡襄〈連日山中帖〉
墨蹟本（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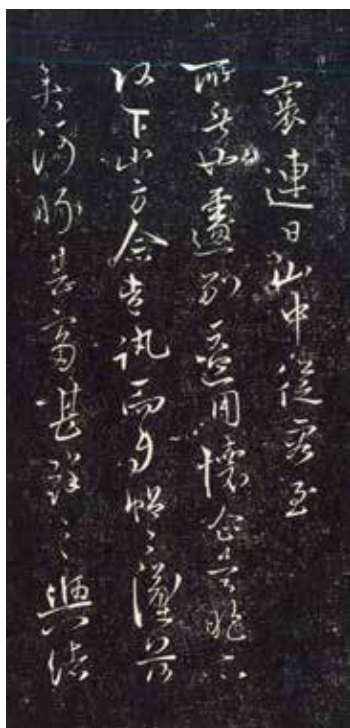


圖 17-2 《福州帖·蔡襄連日山中帖》
拓本影印本（局部）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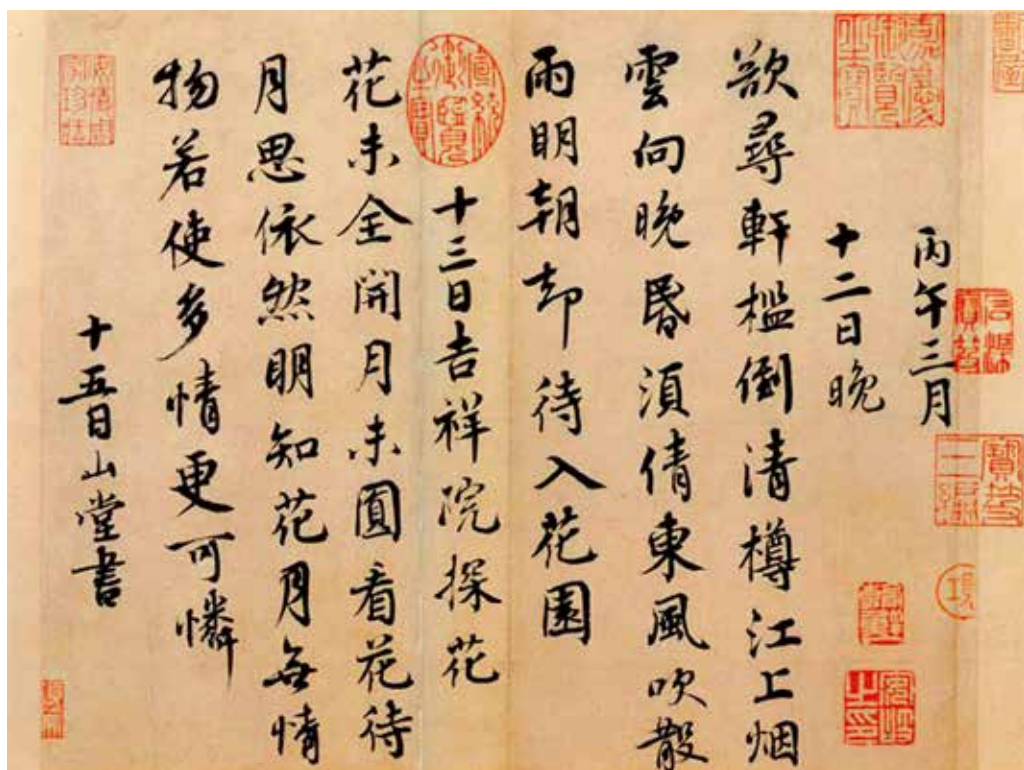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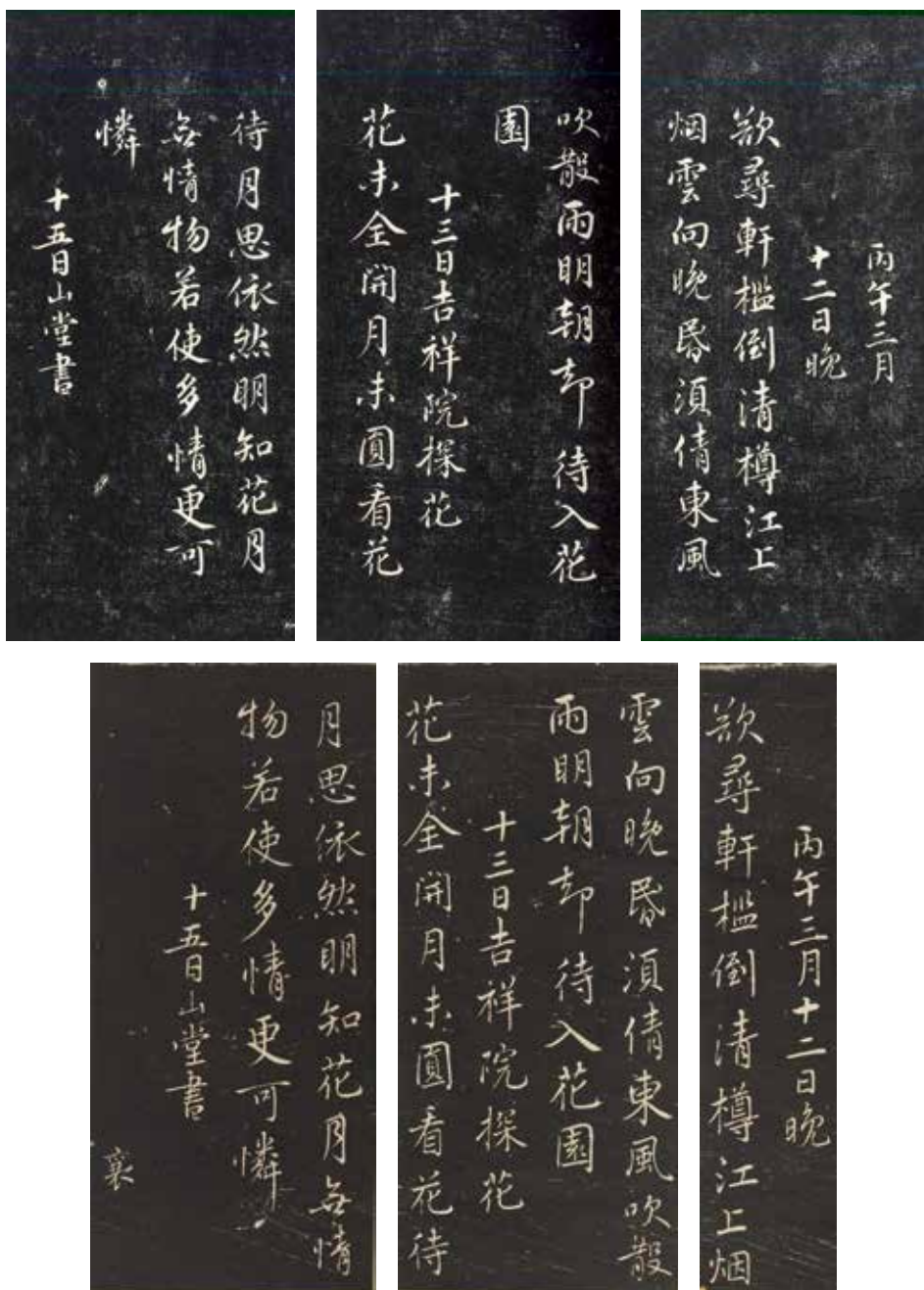


圖 18-1 蔡襄〈山堂書七絕二首〉
墨蹟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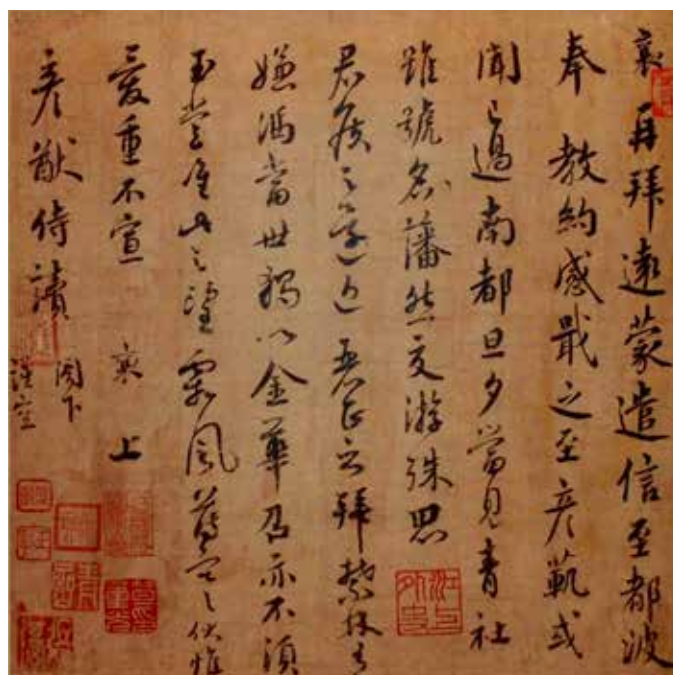


圖 18-2 《玉虹鑒真帖·蔡襄山堂書七絕
二首》拓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上：圖 19-1 《福州帖·蔡襄山堂書七絕二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版

下：圖 19-2 《渤海藏真帖·蔡襄山堂書七絕二首》拓本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上：圖 20-1 蔡襄《遠蒙帖》墨蹟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下：圖 20-2 《三希堂法帖·蔡襄遠蒙帖》拓本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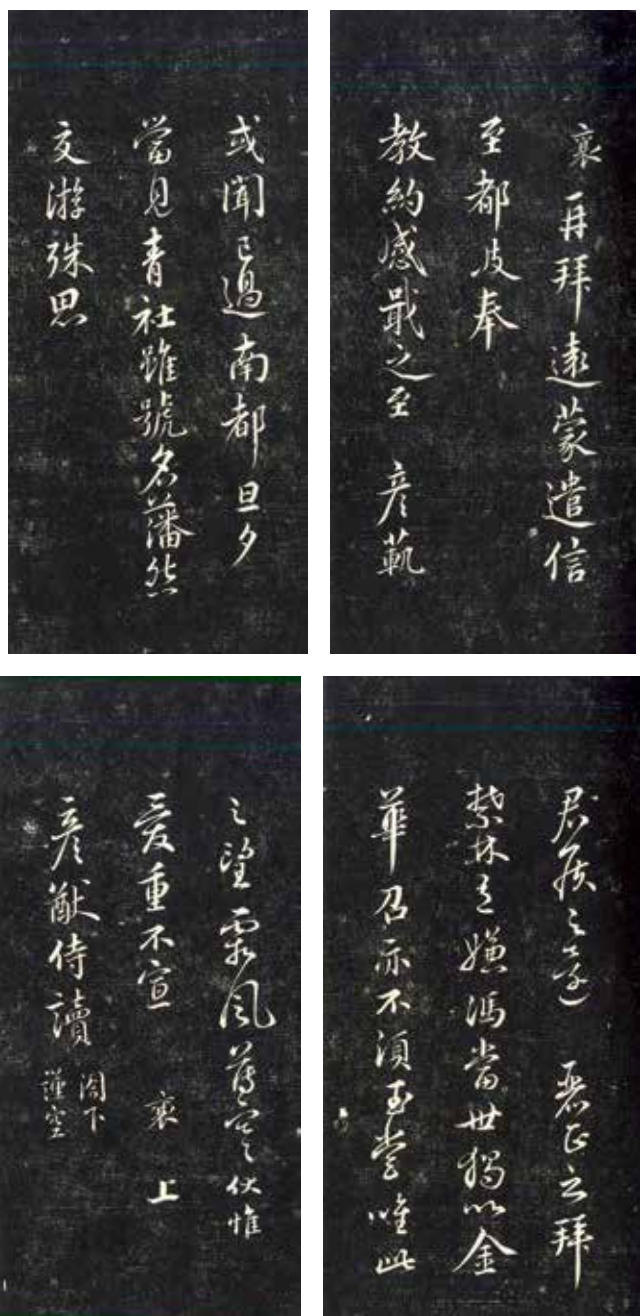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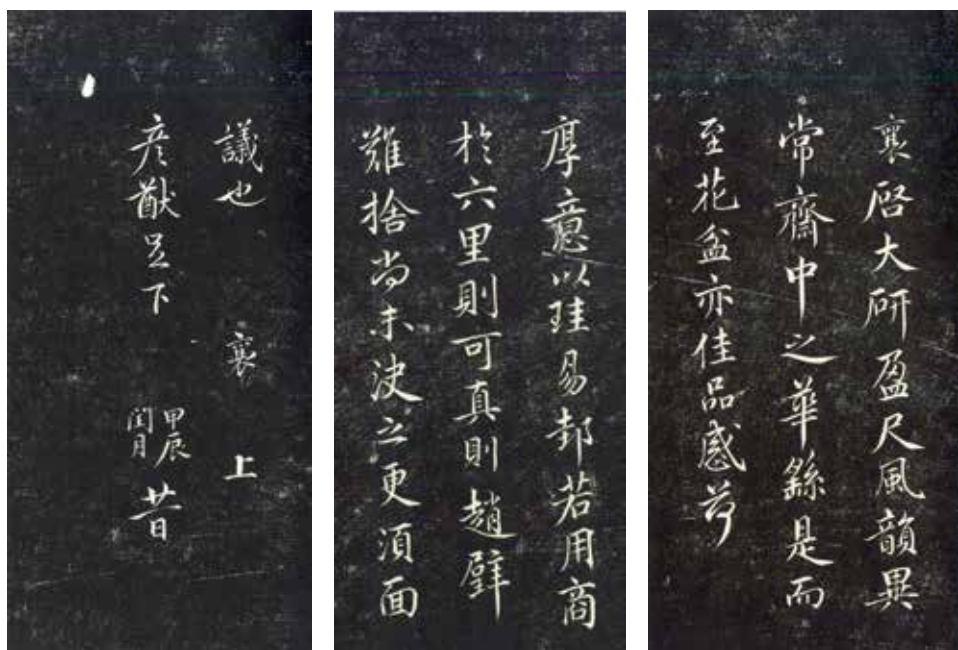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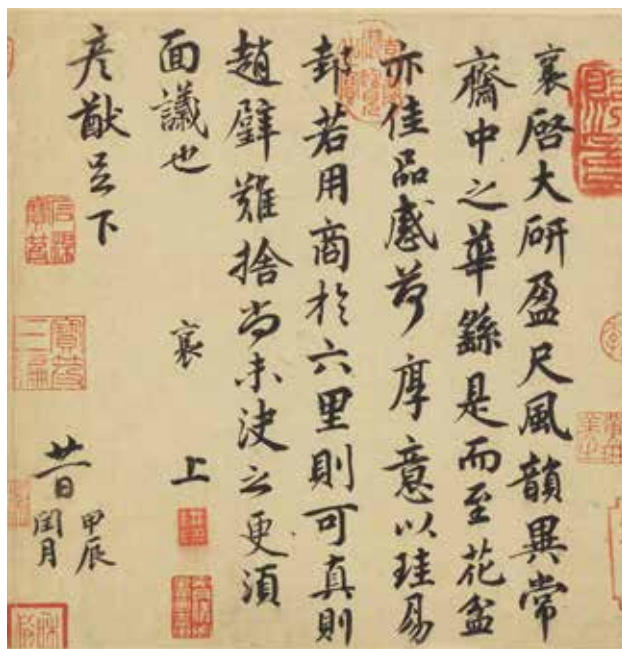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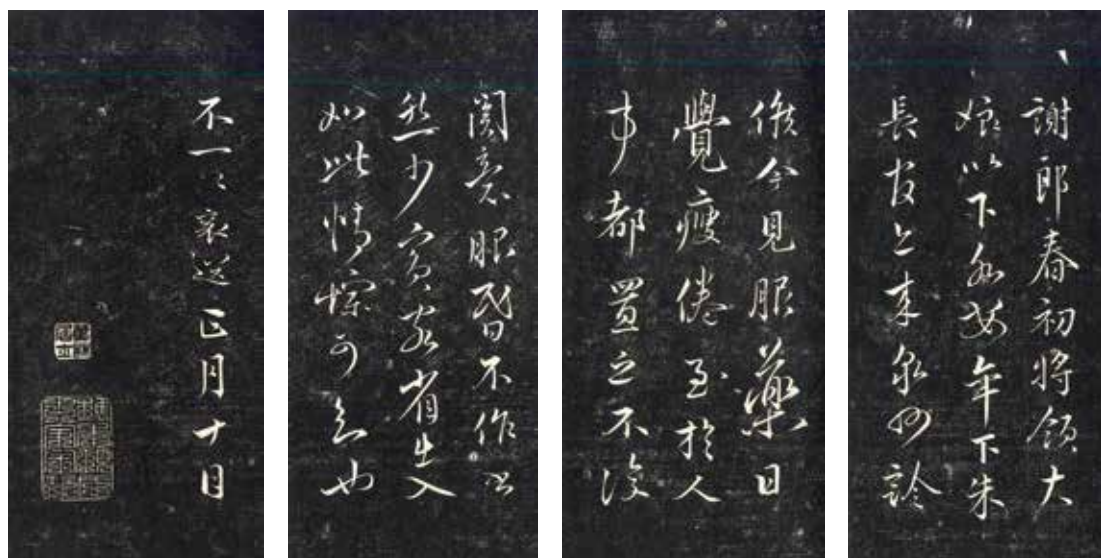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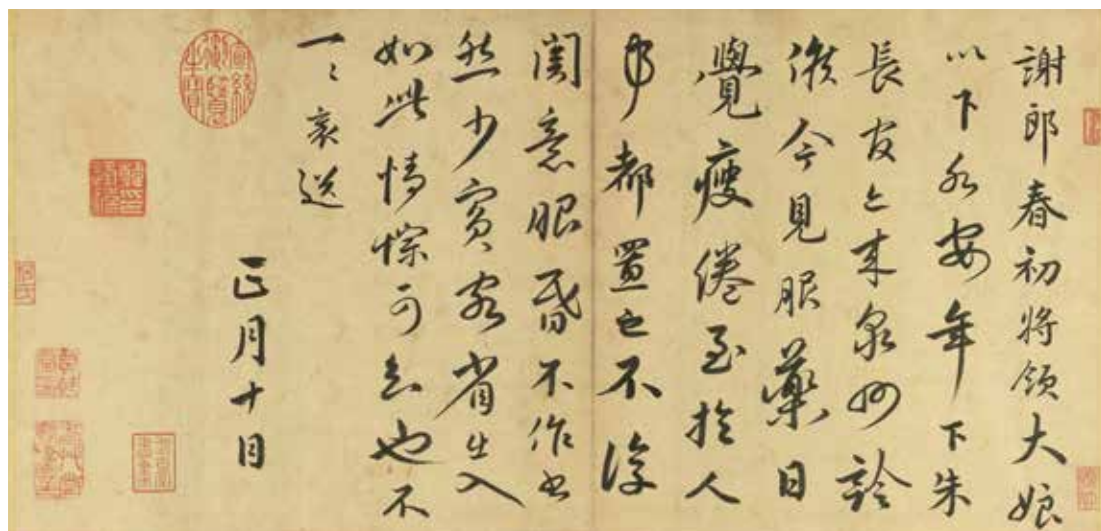


圖 21 《福州帖·蔡襄遠蒙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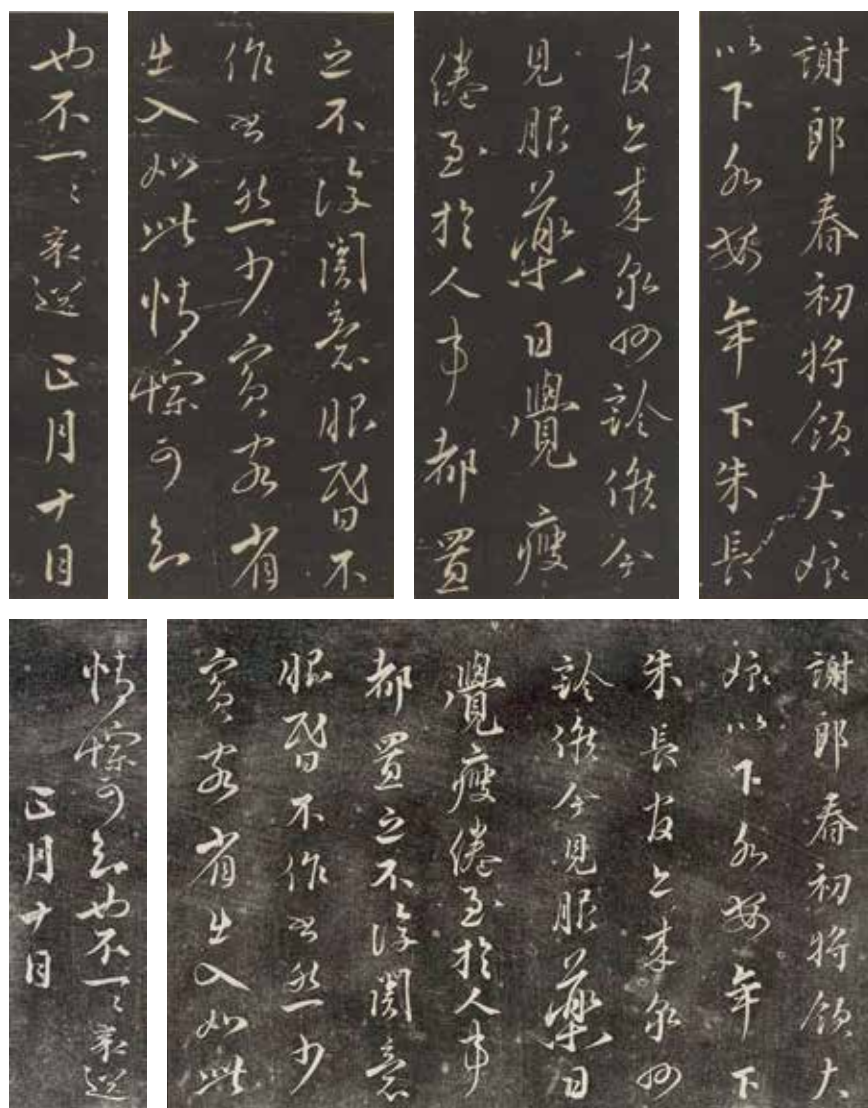
上：圖 22-1 蔡襄〈大研帖〉墨蹟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下：圖 22-2 《福州帖·蔡襄大研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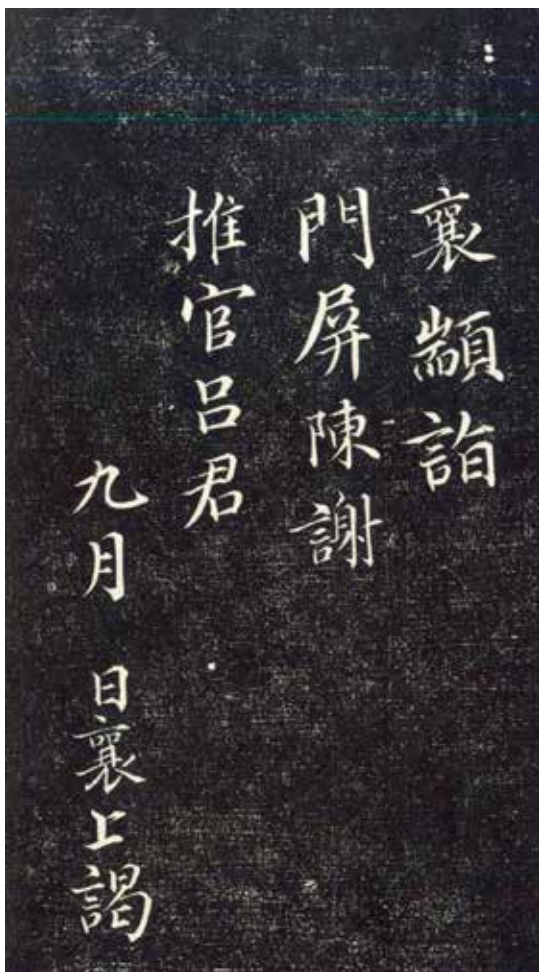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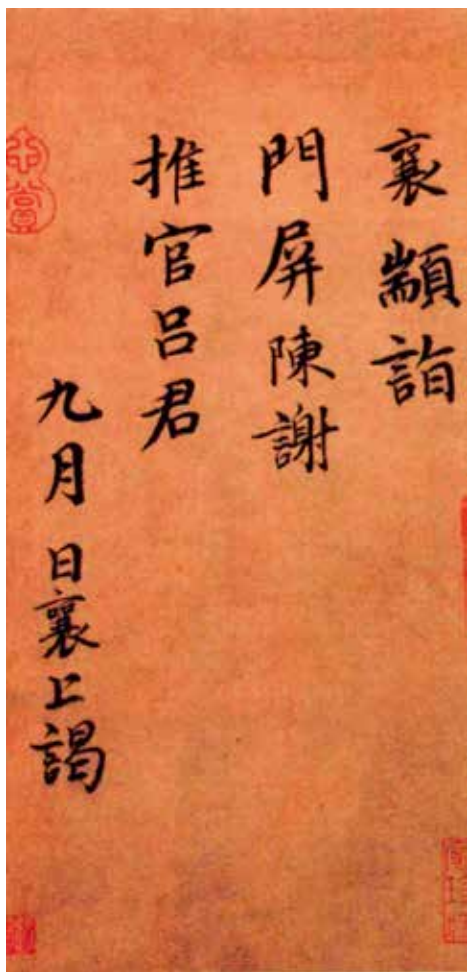


上：圖 23-1 蔡襄〈謝郎帖〉墨蹟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下：圖 23-2 《福州帖·蔡襄謝郎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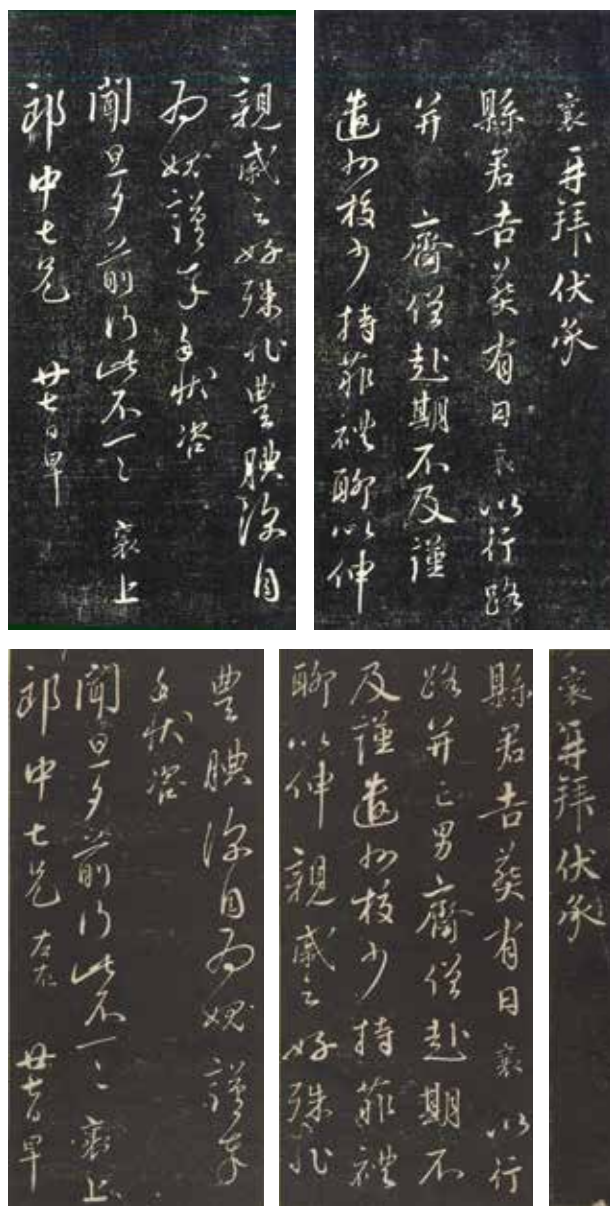


上：圖 24-1 《渤海藏真帖·蔡襄謝郎帖》拓本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下：圖 24-2 《三希堂法帖·蔡襄謝郎帖》拓本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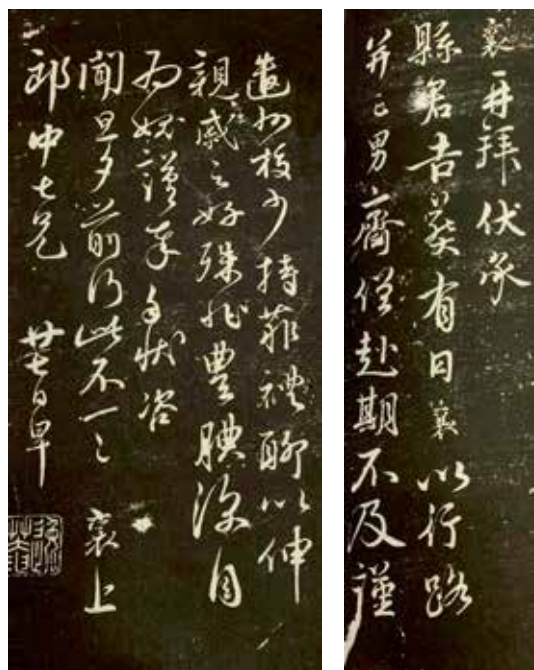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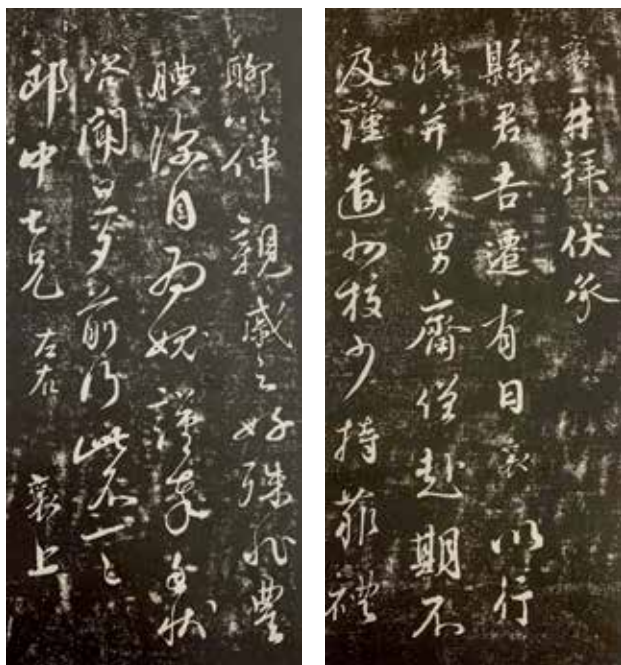


左：圖 25-1 蔡襄〈門屏帖〉墨蹟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右：圖 25-2 《福州帖·蔡襄門屏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版



上：圖 26-1 《福州帖·縣君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版
下：圖 26-2 《渤海藏真帖·蔡襄縣君帖》拓本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上：圖 27-1 《翰香館法書·蔡襄縣君帖》拓本影印本 (局部)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版

下：圖 27-2 《職思堂法書·蔡襄縣君帖》拓本影印本 (局部)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 版